



【编者的话】

20 年前的今天，88 岁的邓小平南巡并发表“南方谈话”，打破了改革僵局，奠定了今日中国经济繁荣的基础。



20 年后的 2012 年，“改革”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很多人把今天中国改革停滞不前的局面，与 1989-1992 年的情况相提并论。

在市场经济改革已经进行很长时间，政治体制改革却被人为搁置多年的背景下，长期积累起来的不同政治、经济利益诉求的分歧已经日益明显，并开始公开化，令人无可回避。从学术圈里的左、右派别观点纷争在社会上影响不断增大；到网路上以“五毛党”、“带路党”划线的网民相互攻击；从各种观点人士之间相互“闹场”、“踢馆”事件频发，到毛派人士发起“公诉茅于轼”的有组织公开行动；从网络意见对高铁的广泛质疑，到南派律师团与重庆公权力对簿公堂；从四年前一边倒对国民党的支持，到今天不少人对民进党蔡英文的青睐，都清晰地反映出了中国社会多种思潮涌动，各种势力面对僵化的体制，争夺话语权和急切求变的心态。面对堆积如山的各种问题，虽然解决方案林林总总，但许多人已形成共识：除了改革，中国别无出路。

“改革还是革命”的话题，又借由韩寒的“三文”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如同文革后对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一样，很多人第一次开始认真思考这些耳熟能详的名词：何为“革命”、“改革”、“民主”？在物质条件已经丰富的条件下，如何才能推动国家社会的良性发展，权力和利益如何重新分配？

继上期关注民主与素质的话题后，本期 1510 周刊聚焦革命与改革，为读者提供一批深入分析这一话题的文章。

不少人认为，现代条件下，由于武器和暴力机器的高科技化，传统意义上的革命不会发生。但我们已经看到，有史以来武力空前的苏联仅仅三天就倒下了。事实是，人心相背才是决定历史的第一要素。所以本期周刊从看历史开始，以史为鉴。针对有人认为是政治体制改革引发了辛亥革命，张鸣教授提出，辛亥革命的发生，不是改革引发了革命，而是改革进入了自己的陷阱，假改革逼迫出来的。郑永年总结出，中国政治变革的一般规律，就是从改革到革命，政治必须与时俱进，否则革命的因素就会开始积累。

毋庸置疑，台湾从威权专制到民主的转型为大陆人民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本期周刊中，张铁志、马国川的文章从民间和政府两个角度记述了台湾转型的历史经验。如何从官与民两个方面推动社会变革，台湾历史不可不看。



最后，笑蜀、杨恒均、周濂的文章总结了什么是革命以及怎样的革命才是成功的，对前两部分文章的论述做出了必要的过渡与升华。以自由为追求的目标，和平的改革也是革命，而革命的本身，也需要以此来界定是否是真正的革命，或许我们没有必要去纠结二者的区别，关键在于行动的目的。

适逢农历新年，1510 周刊将于下周停刊一期。预祝各位读者龙年愉快，我们 2 月 3 日再见。

1510 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录



在 Facebook 分享本期周刊

在 Twitter 分享本期周刊

在饭否分享本期周刊

在新浪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网易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腾讯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搜狐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人人网分享本期周刊

在 QQ 空间分享本期周刊

在豆瓣分享本期周刊



【论】

7-1 张鸣：新政与辛亥革命——改革是否必然引发革命？



“辛亥革命的发生，不是改革引发了革命，而是改革进入了自己的陷阱，当家人身陷其中没能及时自拔。”

自打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问世以来，旧制度在变革中更易引发革命，在近年的学界，成了一种流行论点。美国政治学者斯考切波（Skocpol,T）的有关俄国、中国革命的宏观论述，更是强化了这种观点。中国的辛亥革命，已经成了一个改革引发革命的典型案例。[①] 似乎改革成了旧体制迫在眉睫的催命符，不改还好，一改，死得更快。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就是，不改是等死，改是找死。宁肯等死，不要找死。的确，辛亥革命似乎很能印证这个观点，这场革命，的确发生在清朝最后，也是最认真的一场改革，其过程中打响第一枪的新军士兵，本身也是改革的产物。多少年来，对于中外的研究者而言，一个流行的观点就是，新政的改革，激化了原有的社会矛盾，破坏了原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因而引发了革命。客气一点地说是操作不当，不客气的干脆等于就是说，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具备改革的条件，一改必死。其中，新政诸项改革中，最令人争议的就是废科举，在许多学者看来，这项改掉了中国实行了1300 多年制度的改革，不仅打掉了士子们上升的渠道，而且切断了民间精英跟朝廷的联系。也导致了大批士子没有出路，倾向革命。所以说，革命发生，土崩瓦解，势所必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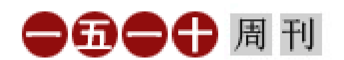
然而，新政真的造成了清朝统治的危机，造成了革命的形势吗？如果真的是改革激成了革命，那么，清末新政有那一项改革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弹，造成了大规模的社会危机呢？新政期间，所有跟新政有关的民变，比如抗捐抗税，抵制清查户口，丈量土地，都是零星的，小规模的，连废科举，都波澜不惊。以至于当时泰晤士报驻北京的记者莫理循乐观地说："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举制度（1905 年 9 月 2 日皇帝敕令从 1906 年开始废科举——注释），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变革。"[②] 原来一直认为是专门针对废科举的民间骚动，山西的干草会的所谓"烧先生，打学堂"之举，现在发现其实好些只是平常的吃大户行为。跟新政没有任何关系。所谓的打烧学堂，只是揭帖传单上的宣传。[③] 这一时期发生在江苏宜兴和浙江慈溪，上虞和余姚等地打砸学堂事件，根据当时的报道，大抵由于经济纠纷。[④] 按道理，改革举措，涉及哪个人群，哪个人群受损，就容易引发冲突。军事改革，面临被裁撤、降等威胁的旧军，出现过哗变和骚乱吗？没有。行政改革，那些被裁并的机构人员闹过事吗？也没有。废科举，事关千万士子的前程，真正起来闹事的人，也是凤毛麟角。严格来讲，新政举措中，真正引发激烈的民间反弹和抵制的，其实是禁烟。当时的朝廷，下决心在几年内让中国禁绝鸦片，从铲罂粟到禁绝交易，多头入手，力度很大。跟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禁烟举措一样，中国的禁烟，也在很多地方都引发了民变。1910 年春，山西山西文水、交城民众抵制铲烟苗，跟官府发生冲突。后来山西巡抚派新军镇压，死伤过百，成为轰动一时的"文交惨案"。[⑤] 1911 年春天，在温州也发生了铲烟委员下乡铲烟，连委员并随从七八人一同被乡民打死的事件。温州事件跟文交事件一样，下乡铲烟的专员，都带有武装，配置新式洋枪，但是，却都遭遇乡民激烈的武装抵抗，规模达到成百上千人。[⑥] 这样的骚乱和民变，在整个新政期间，算是规模最大了。然而，这样的民众骚动，其实跟新政的改革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无论什么时代，只要禁烟，就会有这样的反抗和抵制。在外国学者看来，中国那一时期的禁烟，是卓有成效的。只是到了民国之后，才使得清政府的努力前功尽弃。[⑦]

如果说新政的改革，把人们的胃口吊了起来，形成欲壑难填的求新欲望，倒也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新政到 1911 年，满打满算，不足 9 年，开民智的效果，还不明显。西方的观念，即使在比较开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也只是有限地流行。士绅们比较急切的改革呼声，无非是赶快立宪。他们连模仿日本和德国的钦定宪法大纲，都没有进一步修改的欲望。在武昌起义之

前，立宪和革命，一直是在两个轨道上行走。如果不是新上台的满人少年亲贵肆无忌惮地收权得罪了人，主张立宪的人，并没有革命的冲动。

虽然报纸上时常可见文人们对新政的讥讽，披露新政出的诸如食洋不化的笑话。但总体上，新政的面貌给人印象还是不错的。上面提到的莫理循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新政给北京带来了新的面貌：北京有了碎石子铺的马路，有几好的警察，有良好的秩序，有马车，有外国式的住房，有电话和电灯，今天的北京已经不是仅仅几年前你所知道的北京了。而且，新办的警政，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莫理循称赞道："他们控制的街头交通令人赞佩。各城门不再出现堵塞现象，人人都必须循序而行不准许向前猛冲猛撞。即便是由德国兵驾着的笨重四轮运货马车也不准破坏马路规章。有一个讨厌的士兵装腔作势不肯服从指挥并且拔出他的刺刀来，维持治安的警察便吹起警哨把这个兵逮了起来，押到附近的警察所处。那个兵在当天晚些时候才由一名德国军官从那里营救出去。"[⑧] 得到同样印象还有来自苏格兰的传教士医生杜格尔德·克里斯蒂，他多年一直在奉天行医，在他的眼里，新政期间，奉天一片阳光，鸦片在禁绝，学校在兴办，几位总督都挤出钱来支持他开办医院。雨天泥泞不堪，旱天尘土飞扬的奉天（新政前的北京也是一样。——笔者注），现在兴建起了碎石子路。街上开始出现了路灯，几年后，路灯变成了电灯。随着道路的改善，"在大街上出现了数百辆黄包车，俄式无盖四轮马车已经非常普遍，官员们出行则乘坐国外封闭的四轮马车"。警察也来了，"小小的蓝色岗亭出现在街角"，警察开始指挥交通。奉天甚至组建了卫生委员会，颁布了历史上第一个有关城市卫生方面的法律。[⑨] 不仅城市有了新面貌，开展了地方自治的乡村，治安状况也得到了改善。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研究，都不能否认，跟新政前后相比，新政时期是社会秩序最好的一段。

这一时期的统计数据，也很说明问题。新政时期，是一个民族资本投资的小高潮。从 1903 年到 1911 年，1903 年，新增企业 9 家，资本 599280 元；1904 年，企业 23 家，资本 5222970 元；1905 年，企业 54 家，资本 14813391 元；1906 年，企业 64 家，资本 21278449 元；1907 年；企业 50 家，资本 14573047 元；1908 年，企业 52 家，资本 22527338 元；1909 年，企业 29 家，资本 9947254 元；1910 年，企业 25 家，资本 4944740 元；1911 年，企业 14 家，资本 2290500 元。[⑩] 就此可以看出，在 1903 年到 1909 年这个新政比较健康发展的时间区段内，企业和资本的增加是相当快的。与此同时，国家的财政状



况，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应该说，在支付 4·5 亿两白银的庚子赔款的前提下，作为国家主要收入的关税和盐税，已经被抵押掉了，清政府的财政状况十分困窘。但是，在 1903 年国家岁入 1 亿的基础上，1908 年，国家年财政收入已经到达 2·6321 亿两，如果加上中央各衙门的收入 0·3801 亿，全国的财政收入则达到 3·0122 亿。[11] 不错，在此期间，国家财政出现了一定规模的赤字，尤其最后三年赤字比例比较高，但也没有超过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成立资政院之后，国家有了预算，预算需要经资政院审议通过。1911 年（宣统三年）的预算，原来岁入为 296961909 两，岁出 381357175 两，赤字 84395266 两。但经资政院的审议，岁入增加为 301910294 两，岁出降为 298444360 两，从赤字，变成略有盈余。[12] 不仅中央财政状况大有好转，地方财政也相当宽裕，很多省份都有大量的结余，多的达到上千万两，少的也有几百万两。辛亥革命后民军的扩充，大部分用的是这个钱。

这一时期财政收入的增加，固然有加税的因素。新政期间，的确开征了一些跟新政有关的捐税，比如警务和教育的附加。但也有现代方法的财务整顿的功劳，比如肃亲王善耆兼任北京崇文门税监，采用现代会计制度，严禁关员勒索，但增加部分，年终提奖。最后在短时间内，税收增加了两倍。[13] 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吏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以往税收过程中的跑冒滴漏，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观。而我们知道，传统税收最大的漏洞，恰在于中途的损耗，经手人的贪渎。虽然说，到了清末，清朝的官僚机器，已经锈蚀，吏治的腐败依然根深蒂固，但是，由于新政极大地激发了汉人士绅和绅商的积极性，各地的士绅和绅商，通过地方自治以及办学，兴办各种社会团体的途径，以极大的热忱参与了新政。对于地方官员的不法行为，他们不仅可以通过传统的途径走御史门路弹劾，更可以通过斥诸媒体，全国通电，示威请愿等形式表达抗议。新政时期抵制美货，收回利权和立宪请愿等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显示了士绅绅商的实力和威力。新政时期推行的地方自治，以及预备立宪，给了士绅和绅商参与改革的正式通道，也反过来极大地制约了政府和政府官员的行为。与此同时，自 1903 年苏报案之后，朝廷的媒体政策逐渐开放，大量的民营报纸问世。少数具有革命倾向的报纸自不必说，就是一般的民营报纸，也多半以与官府为难为事业。凡是嗅到官员的贪腐和不法，一定大张鞑伐，毫不容情。在这种特别的情形下，一方面是官员落马的多了。据统计，仅 1909 和 1910 两年，经摄政王载沣批准革职的大小官员，就达千人以上；[14] 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说，这一时期的吏治状况，是有所好转的。在媒体和士绅天天盯着，痛加批评的情况下，至少不可能变坏。吏治好



转，官员贪腐减少，民众的负担就轻，所以，尽管新政增加了许多新税，但民众的反弹却不强烈。后来的革命，实际上是社会中上层对统治者不满的爆发，而非民众活不下去的造反。革命，跟广大的农民基本没有关系。由始至终，农民连响应革命都兴趣缺缺。

当然，废科举的确很有问题。科举制度，本质上是一种选官制度。以考试选官，原本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就目前来看，依然是最佳的制度选择。但是，在古代的中国，这个制度不幸地跟教育制度捆绑在了一起，使得学校教育，基本上以科举为导向，到了明清两代，官学系统居然成了科举的一个台阶，基本上丧失了作为教育机构的功能。而且连带着把民间的私学体系，也跟科举联系起来。虽然说进私塾读书的人，未必都要考科举，但其中学的好的，肯定是以科举为目标的。这样一来，整个学校体系，所教的内容，基本上被科举左右了。显然，这种现象，是导致中国社会其他的技能教育缺失，只能师徒相传，口传心授的一个重要原因。间接地，也跟近代科学技术难以在中国发端，不无关系。

一直以来，对科举的诟病就没断过，而近代则更是把中国之弱归结于这个制度。似乎只有废除了科举，西方的科技才能在中国落地。在废科举的时候，实际上人们是把科举看成了教育制度。所以，废科举，才跟兴学堂相对应。事实上，当时兴办的新式学堂，是面对社会的，目的是给社会输送各类的人才。而科举考试，则是面对官场的，为官场选拔人才。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科举和学校制度剥离开来，保留科举，但降低位置，取消附在上面的种种荣誉和特权，仅仅作为选官之用。而同时废旧学，兴新学。但是，当时的改革，却把这两者捆在一起，一并扔掉了。

不用说，这样的改革，的确会引发一些社会问题，比如会导致民间私学的动荡，私学市场萎缩，一些不发达地区以教书为业的人，生计会出现问题。山西的一些地方，就出现了秀才上街抗议游行的现象。这一时期，山西个别地区打先生，烧学堂的风波，多少跟废科举有点关系。传统的士绅金字塔结构，也会因此而出现麻烦，新学堂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或者留学生，到底要摆放在哪个位置，有点混乱。但是，这种改革并没有导致大批的士子失业，没有奔头。当时学堂一兴，大批的士子都奔学堂去了。当时传说是小学相当于秀才，中学相当于举人，大学相当于进士。当年考一个秀才相当难，但进个小学却容易得多，进中学，难度也不太大。各地都在兴办学堂，名额比当初的秀才的学额，不知多了多少倍。所以，人们实际上是把

学堂当便宜科举看的，蜂拥而至，可以理解。到辛亥革命发生前夜，这些学堂学生多数还没毕业，出路问题，并不严重。同时，由于改革，新事业也在出现。1905 年之后，是中国民营企业的高峰，报馆也在纷纷兴办，比起从前，新的就业机会，还是多了起来。据统计，新政时期也是一个民营资本投资的高峰，加上朝廷因新政而出现各种新事业，士人的机会从另一个方面也在增加。随着朝廷军事改革的推进，投身待遇优厚的新军，也是一种不错的出路。况且，即使新学堂兴办了，但旧式私塾教育，一时半会儿也不可能消亡，整个民国时期，私塾都在顽强地生存。我们不能断定，在新政时期，教旧书的人，就没饭吃了。迄今为止，我们也没看到有关士人失业的确切资料。

那么，士子跟朝廷，或者说政府的联系是否中断了呢？显然也不是。科举废了，民间与朝廷，以科举作为阶梯的联系方式是断掉了。但当时的改革，又创造了其他的联系方式，比如地方自治组织，预备立宪期间的准议会谘议局，以及这些机构背后的各种社会组织，学会、商会、农会等等。我们知道，科举作为一种士子跟朝廷的联系，是无声的。一般来说，除非出现明显的科举舞弊，或者特别的政治事件，士子无法通过科举这个形式，对朝廷发声。但各种地方自治组织，各种商会、学会之类的社会组织，却有这样的发声渠道，更不要说作为士大夫的议政平台谘议局和资政院了。事实证明，自废科举之后，士绅与清政府的沟通和对话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而且增加的幅度非常高。在野士绅和绅商不仅跟地方当局沟通密切，跟中央政府直接对话，也有了管道。即使 1908 年之后上台的满族亲贵政府，也不能完全忽视民间的声音，立宪请愿虽说失败，但也不是没有一点成果——毕竟预备期缩短了 3 年。没有了选官制度，但不能说士子们就没了进入官场的渠道，很多受过新教育的知识分子，比如回国的留学生，有不少都通过一种特别的留学生考试，进入了官场。在改革后的各种新式机构中，洋学生的比例相当的高。进入新军的士人，由于有文化，晋升的机会也多，从士兵变成了士官和军官，也算是入仕了。

至于新政的军事改革，产生的新军成为清廷掘墓人的问题，其实也不能单从表面上看。的确，军事的改革是导致了新军和旧军的矛盾。不仅原来的绿营面临被淘汰，或者转为警察的命运，就是曾经叱咤风云的湘淮军，甚至由部分由淮军改编的练军，也不得不退为巡防营（相当于地方部队或者武警）。面对装备好，待遇优厚的新军，原本应该感到不满的是他们才对。但

是，反倒是新军容易出事，这里有缘故。改革中，由于南方新军比较注重文化水平，因此士兵思想比较新，这样的新，也曾让一部分地方官产生畏惧，觉得这些新军的军官和士兵，有思想上的异动。好些地方都出现了限制新军的举措，平时不发子弹，演习时限制子弹数量，关键时刻甚至连枪栓都卸了。但是，明显作为次等军队的巡防营，却从没有这方面的限制。更过分的是，有的地方官还用巡防营监视新军，造成了跟改革初衷截然相反的歧视。在各个国家，各个不同军种之间，军人和警察之间，都免不了有冲突。试想，在大街上，一旦出现口角，有枪有弹和有枪没弹的人之间，肯定前者气更粗，胆更壮。原本是天之骄子的新军，忽然成了受气包，心气如何能平？其实，当时的思想趋新，是社会的潮流，不见得一定跟革命有关系。把这种新视为洪水猛兽，其实是一些官员的神经过敏，或者，是因为他们自身的思想太旧了。其实，北洋军也是新军，为何北洋军就比较稳定？北洋军里也有不少学堂学生，甚至留学生，为何他们倾向革命的人很少？[15] 很简单，当时没有落到北洋军头上的歧视。

在改革中，新事物和旧事物难免出现扞格和冲突，如果一些官员思想比较旧，喜旧厌新，扞格和冲突就会更加严重。但解决之道在于不断推进改革，让旧的事物得到改造，以新事物取代旧事物。军事改革，目的就是用新军取代旧军，因为只有这样，中国的国防才有出路。改革，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不能因为这些矛盾和冲突，就质疑新事物的“忠诚”。北洋军也是新军，在当时就没有人怀疑他们的忠诚。即使在南方新军中，不稳的人，也只是一小部分。受革命思想习染的新军士兵，即使在被革命党人大规模渗透的湖北新军中，也是少数。就算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到时候能不能革命，也不一定。武昌起义时，湖北的一镇一协新军，在武汉的，差不多有一万人，参加起义的不过三千，而且基本上没有军官参与，其中也难说没有被裹挟进去的。即使按事后革命的人夸张的估计，湖北新军一镇一协一万五千人中，革命党人也不过将近两千，同情革命的人约四千。[16] 事实上，如果不是革命党据点提前暴露，党人花名册落到湖广总督瑞澂手里，而且瑞澂又处置严重失当，杀人示威，导致谣传满天，说瑞澂要按图索骥，大开杀戒，等于反向为革命做了动员，形成了举事死，不举事亦死，而且必死的态势，起义能否如期发动，能否有那么多人参加，都是未知之数。很多地方新军的不稳，实际上跟地方官的反向歧视有关，这样的歧视，激起了新军的怨望之情。即便如此，新军的不稳，也不是全局性的。

至于新政任用的大批留学生的革命倾向，更是可疑。革命之后，很多的人回忆都说，他们自回国那日起，就在准备革命。参加留学生科举，积极投身仕途都是为了争得日后革命的本钱。但是，当年留日学生占据了新军的半壁江山，国内的军事学堂，基本上是留日学生在控制。[17] 但当时他们的思想倾向，到底是趋于革命还是立宪，谁能说得清楚。如果不是革命已成燎原之势，他们能否投身革命，真还不好说。武昌首义，那么多学堂学生和留学生出身的军官，何以只有一个吴兆麟参加了革命？即使有些人在日本留学时参加过同盟会，也不见得回国后一定会坚持革命立场。后来的回忆，往往是靠不住的。比如阎锡山说他和赵戴文两个回国的时候，每人带了一颗炸弹，供发动革命之用。[18] 谁都知道，那时候的炸弹非常不稳定，稍有颠簸，就可能爆炸。革命党人一般都是在日本学会了制作，在国内制造然后使用。谁能坐几天的船，从日本带回去？万一风浪颠簸，在船上爆炸，岂不自己害自己？不管事后说得怎么好听，山西辛亥起义，率先发动的不是身为标统（团长）的阎锡山，而是管带（营长）姚以价，而姚恰恰是个所谓的保皇党人。

当然，新政走下去，尤其是以立宪为标志的政治改革走下去，满人的统治，满人皇帝的统治，是不是像呼吁立宪的官绅们说的那样，皇权永固或者“世袭罔替”？我看不会。当时的王朝，毕竟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这层窗户纸，早就被革命党人捅破，满汉一体的神话，早已破灭。而且经革命党的宣传，满人在入关之初的暴行，也为世人所知，极大地削弱了满人统治的合法性。尽管新政预备立宪时期制定的钦定宪法大纲，皇帝权力还相当的大，但毕竟已经开始厘定皇权的界限，有界限，就意味着有了限制。立宪是要有选举的，按选举的路子走下去，在汉人的汪洋大海中，居于人口极少数的满人特权肯定会越来越受到限制。满人的统治，走向名存实亡或者消亡是迟早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1908 年之后，新上台的满人少年亲贵一边推行预备立宪，一边回收权力，集中资源，力求把大部分的权力和资源抓在自己手里。其实从他们自身考虑，也不是没有道理——把军权，财权以及全国的大部分资源都抓在手里，汉人就是想翻天，不也翻不成了吗？然而他们忘记了，这样做，势必会得罪太多的人，尤其是得罪当时最有实力的汉人士绅，立宪派人士。一旦革命党来放火，就没有人帮着救火了。掌握海陆军大权的旗人，从载沣、载涛到荫昌和萨镇冰，权力是有，但却指挥不了军队。不止是军队不听话，他们自己的威信，能力和胆略也有限。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家族，那个统治集团可以江山永固的。体面地退休，被人赶下台，是两个必然的选项。



革命的发生以及迅速扩散，的确因为朝廷的政策引发了怨望之情，情绪还相当大。但这不是新政改革所致，而是当时当家的满族亲贵，逆改革的潮流而动所致。政治改革的趋势，就是使更多的人分享更多的权力，在当时而言，就是让汉人士绅和绅商，进一步分享权力。可是，把持朝政的满人亲贵，不仅拒绝分权，反而大肆收权，推行铁路国有（收回资源），收回军权，搞皇族内阁（收回并集中行政权），因而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人，代表士绅和绅商的立宪派，也开罪了地方实力派甚至部分地方官僚。此情此景，让这些人造反，到未必能做，但有人造反，他们就能加入。革命党人，恰在此时，扮演了一个放火者的角色，于是，革命之火就成燎原之势了。这期间，1908 年最高领导人换马，绝对是一个时局转换的枢纽。正如费纳克（Vinacke, Harold Monk）所说：尽管新政期间每年都可以看到若干改革，九年预备立宪的方案也切实可行。“然而，由于 1908 年以后局势混乱，或许也由于清政府对于改革缺乏真正的兴趣，这个方案的许多措施仅仅停留在纸面上。”[19] 不肯选择体面下台的满人亲贵，最后实际是被逼下台。虽然小皇帝没有上断头台，但满人整体的命运，却相当悲惨，很多人不得不选择伪装汉人，才能活下去。虽然说，革命的发生，革命党之所以有机会，是当家人少不经事，严重缺乏政治经验惹得祸。但是，改革也的确存在某种政治陷阱，即所谓的“合法性陷阱”。越是合法性不足的统治者，越是容易倾向于以收权来稳固统治，借助强权威慑反对者。人们很容易直线式地想到，抓权在手，总是要保险一点。从而忽略了这样的抓权，会开罪什么人。忘记了所谓的权力和资源，实际上是要由人来掌控的，能力不济，掌握在手里的东西，一样会丢掉。当时的满人，的确处于某种困境之中，少数民族政权，同时入关时又有“历史问题”，经过将近 260 年的养尊处优，整体素质又在下降。试想，如果当时的皇帝，是汉人，而且没有过去的“历史问题”，这样的陷阱，就未必起作用。

可以说，辛亥革命的发生，不是改革引发了革命，而是改革进入了自己的陷阱，当家人身陷其中没能及时自拔。所以说，清王朝不是被改革葬送的，而是被当家人自己一不留神步入陷阱埋葬的。

[①] 参见，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中译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二章第二节和第四节。

[②] 骆慧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第 473 页。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





[③] 参见李天德、李明吾：《长治、高平的干草会》，《山西文史资料》第四辑。长治市文史研究馆：《上党干草会运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

[④] 《辛亥革命》（三）第 389、454、455 页。

[⑤] 王用宾：《记山西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几件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 118 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张之芯等：《"文交惨案"资料四则》，《山西文史资料》1991 年第 4、5 期。

[⑥] 林损：《林损集》中册，第 1031—1033 页。合肥，黄山书社，2010。

[⑦] Francis Clifford Jones, China London, Arrowsmith, (1937)pp148.

[⑧] 《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第 473、431 页。

[⑨] （英）杜格尔德·克里斯蒂：《奉天三十年（1883—1913）》，第 167—170 页。中译本，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⑩] 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93 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11] 周志初：《晚清财政经济研究》，第 140 页。济南，齐鲁书社，2002。

[12] 《前清宣统三年岁入岁出预算表》，贾士毅：《民国财政史》上册，第 25—32 页。商务印书馆，民国六年。

[13]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 31—32 页。台湾，传纪文学出版社，民国六十九年。

[14] 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 563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5] 北洋军至少有日本士官生 30 多人。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第 94 页。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16] 罗尔纲：《晚清兵志》第四卷，陆军志，第 251 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

[17]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第 93—101 页。

[18] 《阎锡山早年回忆录》，《山西文史资料》1991 年第 4、5 期。

[19] Vinacke, Harold Monk . A history of the Far East in modern times. New York: A. A. Knopf, 1928.pp210.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原文链接：http://blog.ifeng.com/article/15565040.html）

【返回目录】



7-2 郑永年：从改革到革命——中国政治变革的一般规律



“一旦当利益集团主导政治进程，或者说现存政权无能克服利益集团的阻力而继续推进改革的时候，革命的因素就开始积累。”

目前中国的改革现状已经呈现出几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各方面的改革缺少动力。经济改革在上世纪 90 年代找到了突破口，确立了基本市场制度，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深化。社会改革在过去的十来年间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变化的需要，如何找到突破口？政治改革在十七大的时候已经确立了“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的方向，两方面的民主试验也在进行，但并没有成为系统的努力，如何推进？第二，改革没有重点感。各方面的改革需求在很快增加，但不知道先做什么，后做什么。面对各方面的压力，不知道从何入手。第三，无论是执政党还是社会，对改革缺少最基本和最低限度的共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人们都指向了问题的核心，即来自利益集团的阻力。改革的未来如何？中国的改革处于一个转折点上。在这个关键时刻，有必要总结一下中国政治变革的一般规律。简单地说，当改革进程停止之时，革命进程就会开始。如果从利益集团的发展进程来说，一旦当利益集团主导政治进程，或者说现存政权无能克服利益集团的阻力而继续推进改革的时候，革命的因素就开始积累。

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政治必须与时俱进，改革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政治的常态。政治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动态，必须从改革到改革，不断更新自己，这样才能可持续发展。

这对任何政体都是如此。在西方民主社会，是依靠政党的周期性轮换来实现动态政治的。但即使是民主政体，也经常因为既得利益的阻力，改革不力，政权也会陷入困局。美国经济学家奥尔逊（Mancur Olson）曾经对利益集团主导的经济发展表示极其悲观的看法。他认为，随

着各种既得利益（分利）集团的形成，竞争受到制约，经济发展缺少动力，出现滞涨。他并不认为民主政治能够克服这些既得利益集团，而是需要用战争、大的社会冲突来改变利益格局。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说，民主政治是既得利益集团设计用来保护其利益的最有效的武器。尽管奥尔逊谈的更多的是经济方面，政治方面其实也如此。

用“开放性”来应对利益集团

中国没有多党政治，在克服利益集团方面会面临更大的困难。一党长期执政本身就很容易形成利益集团。要防止利益集团坐大，防止它们挟持国家的政策议程，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保持执政党的开放性。执政党越开放，利益集团坐大的可能性就越低。用“开放性”来应对利益集团，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开始实践了。在毛泽东时代，执政党主要依靠社会群众运动来防止和瓦解利益集团的。毛泽东搞阶级斗争，搞“大民主”，用一个阶级对付另外一个阶级，政权的主体不断轮换。可以说，在那个时代，除了毛泽东本人，没有一个阶级或者阶层能够主导中国政治。这样做产生了非常负面的结果，主要是妨碍了制度建设。长期处于运动状态，包括法制在内的基本国家制度建设被忽视。当然，那个时代的既得利益非常简单，政治和意识形态是社会的主体，社会经济长期处于低度发展水平。

中国目前的既得利益集团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如果毛泽东时代是一个意识形态主导的社会，那么改革开放后发展出来的是一个利益主导的社会。从意识形态转型到利益是一个并不容易的过程，但也是一个很成功的过程。如果没有中国社会各方面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很难想象中国可以作如此快速并成功的转型。

总体上说，在 1970 年代末到 1980 年代中后期，中国的经济过程相当开放。当时也有各种利益集团，但因为改革刚刚开始，包括农民和工人在内的各种利益都可从改革中获得利益，利益集团之间及利益集团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因此也并不明显。直到 1980 年代后期，当改革遇到困难，各种利益之间，尤其是政治利益之间的冲突开始表露出来，最终导致了 1989 年的天安门事件，改革停顿下来。



1990 年代初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解体，促成了中国更大规模的改革。1992 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执政党发动了新一波更大规模的开放和放权，形成了大规模的利益重新分配局面。传统上的领导阶级例如工人阶级开始被边缘化，而新兴阶层例如民营企业阶层迅速壮大。面临新的局面，执政党开始调整其统治基础，通过修改宪法和制定新的法律来保护私有产权，而且也容许民营企业家进入政治过程，有效地扩大的政权的社会基础。

本世纪初以来，执政党开始调整改革政策。在"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政策理念指引下，试图平衡新兴阶层和传统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主要是要纠正前阶段片面倾向于新兴阶层，而对传统社会阶层的利益重视不够的局面，努力实现社会公平。当然，这样做其实也是符合新兴阶层的利益的。很显然，在基本社会公平正义缺失的情况下，社会问题难以为继，必然要影响到新兴阶层的利益。

国企及官僚成为新利益集团

2008 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个转折点。为了应付危机，国家出台了巨大的财政金融计划。而庞大的财力都是通过国家本身，即国有部门而实施下去的。这就导致了利益集团的急剧扩张。国有部门的大扩张，马上打破了原先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相对平衡的状态，国有企业取得绝对的主导地位，快速地挤占了民营企业的空间。民营企业在 1990 年代中期以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如今好时光不再，它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例如通过移民等方式退出中国社会。

更为严重的是，国有部门的扩张，也没有为传统社会阶层带来任何好处。在传统计划经济下，国有部门是工人阶级的制度基础。但现在的国有部门已经具有了不同性质，国有企业很难说是国家的，而更多地属于国家企业管理者或者国家的代理人的。实际上，国有企业已经成为社会不公正、收入差异扩大、腐败等等现象的根源（本栏早先已经论述过）。

官僚系统本身也俨然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改革开放之后，尽管有"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目标，每次改革也是想缩减政府机构和官僚人数，但实际上是相反的。官僚系统越来越大，社



会越来越小。在分权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层级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例如原来的地区级只是“行署”，即省政府的派出机构，而现在则已经演变成实体，一级政府。同时，也出现了计划单列市。这不仅仅是官僚机构变得庞大的象征，而且更是拦截了中央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官僚机构的无限扩大，必然造成社会空间的缩减。随着财政税收向官僚机构集中，国富民穷变得不可避免。更为严重的是，官僚机构严重和社会脱节，一个个官僚机构犹如一个城堡，和人民没有有机的关联。而且，官僚系统开始演变成独立的系统，它们享受市场的好处，而可以豁免市场的坏处。无论是社会保障、医疗、住房和食品，各种不同的特供系统不断涌现。一个严酷的事实是，中国的改革往往是自上而下，而在官僚系统严重和社会脱节，感受不到人民疾苦的情况下，哪里能够出现改革的动力？

而在各种利益集团大扩张的同时，执政党领导层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能力，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制约，从而大大缩减。因为党内民主的需要，领导层实行集体领导，并且领导层的规模在不断扩大（例如政治局常委从 1980 年代的 5 人扩大到现在的 9 人）。党内民主的程度扩大，意味着权力在顶层的分散状态。因为权力不再集中，权力的行使自然不再有效。再者，因为分权只是对地方政府的分权，而不是向社会的分权，社会组织不能发育起来。同时，社会也没有能够影响政治过程的有效机制，因此既无能对主张改革的领导层有所支持，也不能对既得利益有所制约。

革命进程悄然开始

结果就使得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本文开头所描述的状态。很多迹象表明，当改革不再的时候，革命进程悄然开始。人们可以从方方面面感觉到革命因素的存在。

首先，既得利益集团可以有效影响改革的政策。情况往往是，对有利于它们利益的政策，它们可以最大化；而对不利它们利益的政策，它们可以将其最小化。既得利益甚至随时都可以围堵领导人的改革议程。如果某一改革理念不符合它们的利益，就会群起而攻之，各种手段应



有尽有。因此，有人认为，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挟持了中国的改革议程，就是说，它们可以制定政策，领导层和政府只是它们所形成政策的“橡皮图章”。

人民对官僚系统失去最基本的信任，政府和人民开始处于对立状态，社会抗议运动不断。因为改革的困难，政府很难用改革的方式来化解政府和人民的对立，因此有关部门开始用强制性手段来统治和控制社会，例如“维稳”。更为严重的是，在行使高强度控制过程中，本应当由国家垄断的暴力开始私有化。一些地方政府“外包”公权力，导致了类似“黑监狱”等新事物的产生。一些发展商在“拆迁”过程中雇凶打人，甚至杀人。结果造成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进一步的对立。

应当指出，在任何社会，社会抗议运动是一个常态，也并不是所有社会抗议都会导致革命。但是，具有政治意识的社会抗议，最终必然会导致革命。很多年里，中国社会的很多群体性事件或者抗议运动，都是为了具体的经济利益。但今天，中国社会各种意识形态纷纷崛起，在意识形态上分化社会的同时，也在给社会群体灌输着政治意识。人们可以在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之间作选择，发展出不同的政治意识。意识形态是行动的指南，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必然具有政治后果。

在这样的情况下，既得利益集团也开始感觉到不安全。除了高强度的控制外，它们也需要在思想层面来论证其合法合理性。它们开始在各种思潮中寻找支持力量。不过，这些思想，无论是内生的还是外来的，对它们来说，都只具有工具性质。总体上说，既得利益集团处于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它们不思改革，害怕改革，恐惧于在改革中失去什么。它们只知道不能做什么，而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一些极端的甚至开始对改革进行“妖魔化”。

很显然，当既得利益的终极目标是维持自己的利益，并使之永恒化的时候，它们已经完全没有能力来超越自己的利益。当它们不能超越自己的利益的时候，政治的开放性就必然消失。而体制的封闭性必然导致革命因素的发生和发展。原因很简单。当不能从内部产生变革（改革）的时候，外部变革（革命）就成为选择。

经验告诉人们，这些都是革命进程开始的早期现象，但是革命进程如何进行，还是要看是否存在有效的改革。如果在革命进程的早期实施有效的改革，那么这个进程可以终止。但如果没有，这个进程就会继续，直至革命的最终爆发。历史地看，当革命即将爆发之际，统治阶级

还会进行一次巨大的改革，可惜的是，届时可能为时已晚。晚清的例子最为明显。当光绪皇帝要改革的时候，慈禧太后等保守势力杀了改革者，废了皇帝。但后来，太后迫于形势，为了生存，真的想改革了，并且改革的幅度和力度，甚至比当初光绪皇帝设想的还要大。不过，大势已去，革命已经成为主动力，任何改革都已经难以挽回局势了。

那么，革命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在理想的状态下，革命是你死我活之举，即零和游戏。但革命也往往导致一种同归于尽的结局。无论哪一种情况，牺牲最多的是社会大多数人，尤其是中下层的利益。每一次革命，精英也有牺牲，但与社会的大多数相比，微不足道。对政治来说，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革命的结果很有可能就是没有任何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变化，革命往往是一个再生产的过程，也就是重新走一遍。中国社会真正的变化在于逐渐的改革。改革因此符合各方面的利益，既符合社会大众的利益，也符合既得利益的利益。

尽管革命很多情况下都以悲剧告终，但在既得利益集体无意识的情况下，这种悲剧往往是历史的常态。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很难解释历史上循环往复的革命了。

很显然，对目前的中国来说，改革绝对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改革属于必需。

（郑永年，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原文链接：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8/forum_zp110628.shtml）

【返回目录】

【述】

7-3 张铁志：台湾如何走向公民社会



“.....民主的建立不只需要专制政权的解体，不只要有选举制度和政党竞争，而还必须要深化公民的政治参与、改善民主治理的品质等等，尤其在於在生活的各个层面能有更平等的社会关係。”

1949 年以后，国民党在台湾建立起一个半极权体制，这个体制比其他的威权体制更加严密地控制所有社会组织，并灌输民众意识型态。在社会各产业与职业，是一套细密的党国统合主义来控制；在地方社会，则是透过地方派系的侍从主义来控制与动员。台湾的民间社会只被鼓励去赚钱与娱乐，不可能形成任何自主的社会组织，更遑论公共领域。

到了七零年代初，由于经济现代化的结果，以及国民党政权在此时遭逢的内外危机因而开始放松，社会力[1]开始从长久的高压统治下一步步解放。一方面是新浮现的文化运动，从电影、艺术、摇滚、舞蹈等，尤其是这些文化运动开始思考现实的各种问题；另方面政治反对运动也透过办杂志和串连，逐步组织化。一个未成熟的公共领域开始诞生。但此时所有组织结社都还在党国体制的严密控制之下，民众也还没有强烈的公民意识。

一直要到八零年代，民众才起而争取被侵犯的权利：劳工争取他们被积欠的工资、要求改善劳动条件；消费者争取吃到安全的食品，草根社区抗议严重的环境公害等等。另一方面，各

[1] 指在国家或政党的控制之下，社会自己崛起了，变成了多元的格局（见本期周刊《台湾转型：‘不向历史交白卷》一文）——编者注



社会群体也开始要求挣脱国家的管制，追寻自主空间。那是社会力的真正解放期，不论是环保运动、劳工运动、妇女运动、原住民运动、校园民主运动等等，各个团体都起来争取权利。

在八零年代初期，由于美丽岛事件的镇压，所以政治运动是以办刊物，喊选举组织为主，街头抗争的频率和强度不及环保或经济议题强，甚至可以说社会运动帮政治运动打开了街头空间，但政治反对运动又为社会运动一步步突破了政治禁忌。1987 年解严之后，台湾开启了政治自由化阶段，各种社会运动的频率和强度都更为增加，那是台湾社会运动的黄金时期。

八零年代可以说是一个燃烧的“抗争性民间社会”。在此用“民间社会”，一方面这是当时对“civil society”的普遍翻译，而这个翻译也反映了那个时空的社会现实和想象：当时论者是借用同时期在东欧如波兰团结工联反抗党国体制所使用的论述，强调“民间社会”和国家的二元对立，社会如何挣脱威权国家的控制、获得自主性。“民间社会”论者也强调反对阵营中应该放下统独的歧异，先以对抗党国体制优先。

到了九零年代民主化之后，对抗性的“民间社会”逐渐转变为所谓“公民社会”。所谓“公民社会”，期待的是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预设一个理性讨论的公共领域，以及强调国家与社会并非二元对立。所以，在“民间社会”时期，民众是要求国家退出社会领域，如不再控制媒体、工会、校园等；在“公民社会”时期，则是要求国家重新介入社会，如媒体改革和社会福利都需要国家某程度介入。前者是反抗性的；后者则是民众的自我组织，并需要社会和国家关系的重构，以及建立一个多元思辨的丰盛公共领域。

这个转变主要是因为在九零年代，一方面威权体制逐渐崩解，人民的基本权利获得逐步保障，形式民主被逐渐建造起来，所以不太需要强调社会与国家的对抗。另一方面，人们也开始认识到民主的建立不只需要专制政权的解体，不只要有选举制度和政党竞争，而还必须要深化公民的政治参与、改善民主治理的品质等等，尤其在于在生活的各个层面能有更平等的社会关系。

在这个时期，公民社会与国家或者政治部门的关系还有两大变化。

首先，原来处于激烈对立的社会运动与国家部门的关系出现几个重大调整：1.社会运动更为制度化、专业化；2.国家的统治技术开始改变，一方面设立新的法律来承认新的公民权利，

另方面也给予更多管制与限制，如 1988 年制定的“集会游行法”；3.政府开放社运团体的政治参与，或者是说将他们整编入既有的权力体系，不论是 NGO 团体的代表被纳入政府决策机制，或是新设立的政府组织如总统府人权委员会、行政院妇女权益促进会、非核家园宣导委员会邀请这些民间团体。

当然，这个改变并不代表传统的议题和抗争剧码就从此消失了。立法院和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从来没有停止过人民的喧嚣与黄色的布条。不过，在八零年代获得新公民身份的人们，确实开发出不同方式去改变传统的权力结构或者政治想象（见本书“台湾的新公民运动”一文）。

另一种关系的转变是民间团体和政党之间。从八零年代起，由于许多社运抗争（如环保、人权、劳工等团体）的反抗目标都是指向执政的国民党的政策，所以和作为反对党的民进党有比较强的结盟关系，并且都可以被视为处于相对于党国体制的“民间社会”；或者说，这个结盟关系在许多例子中其实是民进党为了建立反国民党社会联盟，而主动直接涉入、影响这些社运团体。也因为这个结盟政治，民进党在价值上比较愿意接受这些进步理念。

但这个“不神圣同盟”在九零年代随着民进党完全采取“选举总路线”，并在政治上影响力越来越大而逐渐变质。此时民进党不能再被视为“民间社会”的一员，而是“政治社会”中的行动者。这也使得社会运动团体成员开始出现面临民进党结盟关系的重新调整。

政党轮替后，两者关系重新调整的需要更强烈。一方面许多社运人士被吸纳进新政府，或者这些团体被纳入政府部门的决策机制，因此造成许多社运团体更认真思考自主性。另一方面，他们也更清楚认识到民进党完全是政治逻辑主导，很难被期待。所以他们必须去走自己的路。

从民间社会到公民社会，台湾人民一直在追求建立自主性，重建与国家和政治行动者的关系。我们还在这条路上。

（本文刊登于《阳光时务》电子杂志第四期，并将收入于作者即将出版的新书《民主在路上》。）

（张铁志，台湾知名政治与文化评论人，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原文链接：https://cochina.org/2012/01/台湾如何走向公民社会/）

【返回目录】



7-4 朱云汉、马国川：台湾转型："不向历史交白卷"



"'打江山坐江山'是前现代社会的权力逻辑，现代社会'主权在民'，国家不是一家一姓一党的，人民选谁就是谁，要通过竞选实现权力的和平交接。蒋经国看到了历史大趋势，很清楚如果逆潮流而动，就会积累更多的矛盾。"

采访/马国川

为了迎接辛亥革命 100 周年，海峡两岸都在积极筹备纪念活动。两岸虽然发展道路不同，但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创造和积累了宝贵经验，共同丰富着中华文化的内涵。

30 年来，大陆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不但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评价，也为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厚植基础。

25 年前，台湾地区成立"政治革新小组"，正式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如今，在许多政治研究者看来，这是华人社会民主转型的一个成功案例。

台湾地区的政体转型经验受到了高度关注。"至少在东亚地区，台湾转型的成本是最低的。"台湾政治大学朱云汉教授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

朱云汉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学家，长期研究东亚政治经济和民主化，目前担任"亚洲民主动态调查"国际学术合作项目的负责人。不久前，他受大陆有关方面委托，主持完成了《台湾转型经验》课题。

朱云汉教授认为，"台湾政体转型里蕴含着一种普遍意义的经验。"进一步的总结与思考，对于台湾未来极为重要，其转型启示也具有更长远的历史价值。

国民党主动转型的内外因素

《财经》：台湾经济在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起飞，70 年代后期跻身“亚洲四小龙”行列，此后一直高速增长，为什么在 80 年代中期主动政治转型？

朱云汉：台湾转型有两方面因素。从外部说，1971 年尼克松访华颠覆了国际格局，冷战格局发生变化。此前，美国为了确保有效地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鼓励东亚采取高压政策。

从卡特总统开始，美国实行“人权外交”，引导东亚政治更开放。所以，台湾压力很大。

另外，1978 年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对台政策改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在此之前，台湾与大陆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国民党有理由不实施《宪法》所允诺的公民结社自由，国会也不能改选，以维持“正统”的象征。两岸关系缓和，使国民党长期维护的那一套制度安排丧失了说服力。

首先，从内部说，经过战后 30 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台湾内部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私营部门经济成为经济主导，政府不再掌控一切。尽管上世纪 50 年代台湾没有像大陆那样搞计划经济，但是台湾的公营经济也是经济主干，一直到 60 年代、70 年代初期都是如此，垄断性的、资本密集的、高技术的、有规模经济的企业，差不多都在政府手里。80 年代私营经济成为经济骨干，对于政府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

其次，随着台湾高度城镇化，白领阶层、专业人士大量涌现，中产阶级成为社会骨干。中产阶级成立了各种联谊性或行业性的社团组织，这些社团开始逐渐地对公共议题感兴趣。公共议题虽然看起来不是那么有政治性，但最后需要政治来解决。于是，这些社团也逐渐有了一定的政治性。

《财经》：国民党有一套管理、监控社会的组织机制，为什么没有发挥作用？

朱云汉：原来确实有，但是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原有的组织机制已经不能够适应社会的多元变化，国民党当局也不可能完全掌控，只能抓一些对政府依赖性比较大的社团。



台湾有一个概念叫“社会力”，即在国家或政党的控制之下，社会自己崛起了，变成了多元的格局。

然后，社会里又生长出了政治反对力量。

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新生代党外力量”开始出现，外部环境也给新生代党外力量某种程度的激励。和早前的反对力量不同，新生代党外力量可以直接在社会里找到自己的基础，因为台湾的政治土壤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财经》：国民党是否意识到了政治反对力量的出现？如果意识到了，为什么没有采取遏制政策？

朱云汉：面对党外力量的兴起，面对开放政治体系的诉求，最初国民党还是压制的，但是压制的成本越来越高。是用更大的力量去压制，还是做一些温和的回应？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开始，国民党一直在镇压和沟通之间游移不定。牵制国民党的因素有两个：首先是美国因素，其次是国民党自己在政治上有一种深层的不安全感。

《财经》：所谓“深层的不安全感”，是不是国民党感受到了某种危机？

朱云汉：是的。国民党感觉到一种合法性危机，就是“政权到底代表谁”遭到质疑。国民党核心结构都是从大陆来的，反对运动指责国民党是“外来政权”，而且是“蒋家天下”的垄断性统治体。在台湾，国民党既不民主，在族群上又是少数。

它不敢民主，因为如果实行了民主，执政的位置也就保不住了。国民党也意识到族群社会代表性不足的弱点，如果全面镇压，就会被刻画成“外省人迫害本省人”。所以，国民党在镇压的问题上特别慎重。

事实上，自从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地位巩固之后，对于本省籍的异议分子基本上没有处死过，以免激化省籍矛盾。

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多重新因素逼近，国民党到了不得不作决断的转折点。

“不得不调整的历史关头”

《财经》：新的因素是什么？

朱云汉：随着民主第三波的发展，民主化这把火已经烧到了东亚。1986 年菲律宾马科斯政权垮台；韩国学生进行了一个月的静坐抗争，全斗焕辞职下台。这些对于台湾地区的党外运动有很大的鼓舞。

国民党的接班人问题也开始凸显。不止蒋经国个人的接班问题，整个国民党高层都面临后继乏人的局面。因为 1949 年跟蒋介石来台湾的“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大代表”都已经老了，这场戏已经唱不下去了。

还有，党外的力量也在一直冲撞，在逼着执政者作选择：是全面镇压、升级冲突，还是回应一部分诉求？特别是，在党禁的体制下党外力量已经宣布组党，是承认，还是取缔？

三个因素都挤压在一起，蒋经国明白，已经到了一个不得不调整的历史关头。

《财经》：尽管民主化的浪潮涌到了东亚，但是与菲律宾、韩国比起来，当时台湾社会更倾向于安定，而且党外的力量也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和动员能力，是这样吗？

朱云汉：确实，当时台湾多数人对于巨大的政治变化仍然有点迟疑。所以，党外运动从来没有机会，也没有实力去组织那么庞大的群众运动去颠覆。

在日渐逼仄的国际环境和东亚民主浪潮的压力下，多数台湾人，包括中产阶级有一个共识，即台湾必须采用渐进的、和平的方式，来逐步调整原有体制，而不是进行一步到位式的激进改革。否则风险太大，大家不愿意承受剧烈的震荡。

另外，国民党过去的高压政策逐步收敛，政治犯较少。台湾经济发展的分配也很公平，大家都是受益者，所以人们也不希望剧烈的变化。

《财经》：也就是说，当时台湾人基本上是有一个共识的：要搞民主化，但应该是渐进的、和平的？

朱云汉：国民党营造了一个主流思想：我们要民主改革，不是革命，而且民主改革不能影响经济发展，不能影响社会安定和台湾安全。

不过，国民党也认识到，必须回应党外运动的冲撞，否则支持他们的人会越来越多。

《财经》：在上世纪 40 年代，陈立夫曾对沈钧儒说，“我们流血打下来的江山，怎么可能在谈判桌上就给了你们呢？这不可能！”按照这样的逻辑，既然权力在我手里，就不能轻易地放弃。当时国民党高层是否仍然秉持这种逻辑呢？

朱云汉：“打江山坐江山”是前现代社会的权力逻辑，现代社会“主权在民”，国家不是一家一姓一党的，人民选谁就是谁，要通过竞选实现权力的和平交接。蒋经国看到了历史大趋势，很清楚如果逆潮流而动，就会积累更多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蒋经国选择政治改革，其实是在顺势而为，趁他自己还能够主导大方向的时候，先启动改革，把台湾推上轨道。

当然，如果没有内外压力，他就没必要这样做。事实上他周围的许多人也不会赞成他这样做。因为他们觉得，这一步走下去，以后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覆水难收。

《财经》：所以，蒋经国是在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

朱云汉：对，并不是每个坐在他这个位置上的人都会做出这样的事。蒋经国为什么会这么做？

第一，整个台湾的社会精英都已经接受了民主的价值观，认为民主是该走的路。这也是一个共识，只不过以前总是说暂时还不能走，但从来没有认为民主是不值得追求的。在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台湾站在了完全不一样的位置，历史坐标不一样了。

第二，蒋经国面对的是本土社会的政治觉醒，本省籍精英要求平等分配政治资源。如果完全用高压的手段去处理的话，受迫害者会把矛盾转化成外省人与本省人的族群矛盾，进而导致反对力量号召更大的动员力量，对现政权做更无情的反扑。

在台湾民主转型之前，其实国民党政权还没有经受真正的大考验。台湾还没有出现社会运动式的冲击，只有零零星星的一些现象，但是苗头早已经出现了。



《财经》：蒋经国曾说“不向历史交白卷”。在当时的历史关头，作为威权人物的蒋经国如果向另外一个方向转化，台湾是否可能出现大混乱局面？

朱云汉：对，很难想象的局面，反正会是另外一个局面，政治问题可能会积累得更大。

决心既下，蒋经国准备分几步走进行通盘的体制调整。第一步，从 1987 年开始解除戒严，开放党禁。第二步，把国会改选排上日程。还没有走到第二步，蒋经国就去世了。但是他已经把台湾推上了一条新轨道，接下来只能往这条路上走，没有其他可能性。

台湾的“增量民主改革”

《财经》：在台湾地区执政 40 多年的国民党，为什么能够度过威权体制松动与崩解的危机，而且还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享受民主转型的政治果实？

朱云汉：因为国民党上世纪 50 年代就开放地方选举，70 年代末期又扩大了“立法院”的增补选。在大陆时选出的“立法议员”不能动，但是增加一点台湾选众的名额，而且这些名额是定期改选的。所以本省的政治精英可以来参加“立法院”选举，这样既可以满足当地政治精英的政治参与需求，又不动摇国民党的政权。

《财经》：这是否也算是一种“增量改革”，存量不动？

朱云汉：没错。台湾的“立法院”选举是一个“特区”，越做越大，到后来竞选名额已经占到了将近三分之一。

国民党从乡镇开始不断运作，培养了自己的参选人才，运作了 30 多年，而且经历了几场选战，知道怎么去运作。在党外力量冲撞之下，国民党不能不开放政治体系时，仍然有不失去政权的把握。因为对它来讲，只不过要玩一场更大的游戏而已。

更何况，国民党有各种优势，司法权在手上，经费也很充裕，通过一套利益交换体制，吸纳或拉拢了各种地方力量。到蒋经国时代，很多本省精英在国民党里慢慢已经到了较高的位置，国民党已经开始本土化了。

所以，国民党能在很长时间享受政治体制改革的果实，秘密就在于，国民党已经实现了局部性的以选举为核心的民主竞争机制。政治上国民党有操作的条件，另外，总体上来讲国民党的确也为台湾提供了 30 多年稳定的经济增长和繁荣，创造了一批庞大的利益受惠者。

《财经》：是不是可以说，国民党的绩效合法性很高？

朱云汉：是的。甚至李登辉时期，国民党的绩效都是很高的，所以党外力量想挑战李登辉是不容易的，民众也不觉得民进党可以真正替代国民党。

在实现民主化转型 14 年后，国民党之所以失去政权，是因为国民党自身的分裂。李登辉时代，新党分裂出去了，宋楚瑜也分裂出去了。连战和宋楚瑜合起来还是 61％的选票，他们鹬蚌相争，让民进党钻了空子。民进党还没有累积起真正的社会基础，就仓促上台了。如果连战跟宋楚瑜没有分家的话，国民党 2000 年是绝对赢的，而且很可能到今天还在执政。

《财经》：如果把台湾地区的特殊情况剥离掉之后，按照国民党的实力和经验，是否可以在很长时间保证它的执政地位？

朱云汉：历史没有办法假设，不过，国民党的执政时间至少会比我们现在看到的更长。

即使民主化了以后，在最初的十几年里国民党仍旧有非常高效的组织根基和资源动员能力，远远超过常态民主下的所谓"政党"。因为它原来是一个以党治"政"的党，现在只是稍微削弱和调整了一点，民进党远非对手。

在这个意义上，当初以党治"政"对国民党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但是一旦失去政权，就不一样了。因为国民党原来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依托对政权机构的掌控。现在台湾的政党回归到正常状态，以选举为核心，政治精英培育也主要通过选举产生。

"台湾转型的成本是最低的"

《财经》：从台湾地区的经历来看，民主转型和经济发展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朱云汉：民主转型和经济发展是非常动态的辩证关系。经济发展创造了民主转型的社会条件。国民党的经济发展路线所取得的成果，为台湾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

台湾不是在社会矛盾积累很厉害的情况下来面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而是在社会分配问题并不尖锐，多数人基本上能够参与分享经济成果的前提下，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所以，台湾的渐进式改革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

发展导致公众政治参与意识的提高，也产生了党外运动的新社会土壤，但是没有严重的社会矛盾可以让反对力量利用。相反，因为渐进改革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可，让国民党可以有某种主动性来回应改革的要求。

假如经济分配矛盾累积很深，反对力量就可能积累起巨大的社会力量，动员到一定程度，就有政治崩盘乃至内战的危险了。

民主化给台湾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冲击，首先技术官僚不再享有政策自主性，他们过去可以主导中长期经济发展策略与产业政策，现在政治领导结构经常变动。同时，企业可以透过政治献金与民意代表来影响财经政策，原来的规划与协调机制无法有效运作。

民主竞争机制让社会分配议题、劳工议题、环境议题高度政治化，这些议题与经济发展间的矛盾更不宜调和。选举的压力也让政治人物倾向忽视财政纪律，一手大幅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另一手大幅减税，导致台湾财政结构急速恶化。

这些都是台湾新兴民主面临的经济治理难题。

《财经》：所幸的是，台湾避免了最坏的结局。

朱云汉：政治参与的大门打开了，社会力量就可以通过选举进入政府平台。国民党高层的结构也发生变化，企业界、民营报纸老板等开始进入权力核心。他们开始影响政府决策与法律制定。这时，国际上的新自由主义思潮高涨。

民营经济的精英们不断批评国民党的经济管制和公有部门垄断。国民党也意识到经济管制和公有部门垄断不合潮流，技术官僚也主张放松管制，破除垄断。于是开始“市场化”，“去管制”，很多特许行业开放了。

这样做削弱了国民党的一些政治手段，多少也动摇到它的基础。因为原有的经济控制体制对于维持国民党政权也有一定的重要性，特有部门里庞大的员工是国民党的巨大票箱，可以左右地方的选举结果。当然，“市场化”的好处也是显见的，因为原来的经济管制与垄断会产生很多寻租，“市场化”消除了寻租的土壤。

《财经》：在许多学者看来，在全球民主化第三波里，台湾是一个成功的个案。作为一位政治学家，你认为台湾成功转型的经验是什么？

朱云汉：第一，台湾转型的社会成本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整个经济社会生活没有受到重大的影响和破坏。至少在东亚地区，台湾转型的成本是最低的。

第二，台湾转型尽管产生了认同危机，但是并没有真正拖垮民主进步的前行。在有些国家或地区，这种危机可以让民主无法运作，甚至导致政权分裂、社会肢解。而台湾在比较困难的历史条件下，民主还可以维持平稳运作，经过两次和平交权，很了不起。

第三，台湾在政治转型之前是一个一党威权的体制，这种政治体制进行民主转型，执政党通常在重大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中崩解，东欧转型就是如此。

而国民党在政体转型启动后的最初 14 年里，始终能够通过选举来维持政治上的支配性地位，成功经历四次改选均能维持多数党地位，这种和平转型是非常罕见的。

《财经》：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台湾转型经验显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威权体制下的主政团体如果主动推动渐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一定会导致很快失去政权的危机？

朱云汉：反而有可能让自己的执政地位重新获得巩固。国民党的转型经验也显示，政党有可能在主导民主转型过程的同时，营造一个“支配性一党体制”的出现。而国民党在上世纪 90 年代所建立的“支配性一党体制”，如果没有遭遇认同冲突的撕裂性冲击，原本应该具有更高的存续能力。

从日本的经验来看，支配性一党体制的长期存在也不一定阻碍民主政治的巩固。所以，从理论上来说，不应完全排除以“党国体制”为起点的双重转型也可能出现成功的民主转型。



台湾地区的经验里蕴含着一种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另外，台湾经验还蕴含由历史条件所形成的一些特殊情况，其他社会都没有，因此无法复制。

（朱云汉，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著名政治学者。马国川，资深媒体人，任职于《财经》。原文链接：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11-07-03/110763626_3.html）

【返回目录】

【鸣】

7-5 笑蜀：革命需要啄木鸟——兼论韩寒《谈革命》



“新时代的革命，与传统革命最重要的分别在精神上，即它不是反自由的，而以自由为灵魂，以自由为最高尺度去丈量革命，看它的全过程、所有手段、所有细节，是否真的兑现了它所承诺的自由。”

革命应该是向着自由的革命，即革命的目标，应该是以自由立国。所谓立宪，宪者何谓？限制权力保障自由是也。革命乃革暴政之命，暴政何以必须扑灭？也仅因为其侵犯自由是也。所以，自由之于革命，如睛之于龙。无睛之龙不是真正的龙，那不过是龙尸；不向着自由的所谓革命，叫政变，叫叛乱，叫暴乱，叫改朝换代，都可以，就是不能叫做革命。

但自由不只是革命的目标，不只是龙之睛，它更应该是革命的灵魂，而贯穿于革命的全过程，贯穿于所有的革命手段。即，革命不是别的什么，抵抗暴政保卫自由而已。不是等到革命完成才让人自由，而是革命的全过程，所有手段，都直接为着自由抵抗暴政，不只抵抗来自外部的暴政，尤其要警惕和抵抗来自内部的即革命本身的暴政。

来自革命本身的暴政，史上不绝如缕。以至革命往往成了绞肉机，成了对于自己营垒的大规模杀伤武器。这里的原因当然很多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则是自由的丧失。法国革命如此，俄国十月革命亦复如此。十月革命之前，卢森堡与列宁有过一场激烈的论战，革命与自由的关系，则是论战的焦点。卢森堡断言：列宁把“布朗基密谋集团的运动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运动中来”，最终结果，必然是革命的蜕变“自由受到限制，国家的公共生活就是枯燥的、贫乏的、公式化的、没有成效的，这正是因为它通过取消民主而堵塞了一切精神财富和进步的生动活泼的泉源。”



仅仅如此也就罢了。而最惊心动魄的，是卢森堡如下一段预言：

“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惟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纯粹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不仅如此，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野蛮化：暗杀，枪决人质等。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

显而易见，卢森堡不幸言中。革命的长虫一旦没有自由的灵魂驾驭，就跟其他暴力机器没有了区别，而退化到野蛮状态，不分青红皂白地吃人就成了它的本能。即，所谓革命已蜕变成彻头彻尾的暴政。它比普通的暴政不过多了一样东西：所谓革命的神圣光环，因而可以高踞于图腾位置，一边享受血流成河的吃人盛筵，一边享受千万善男信女的欢呼和膜拜。

这种模式的革命，我把它称之为传统革命。传统不仅表现为暴力性质，更表现为内在的精神气质，即反自由的精神气质。它号称为了自由：砸烂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但它把自由的目的跟革命的过程、跟革命的手段割裂，把自由看做是自由进程的绊脚石。这种怪诞逻辑最经典的体现，就是名篇《反对自由主义》。

一切为了胜利，哪怕牺牲自由也在所不惜。革命对自由的侵犯，对人的压迫，就这样被赋予伦理上的正当性，不容质疑。质疑革命侵犯自由的卢森堡，到了斯大林时代，竟成了敏感词，谁引用她的话便是反革命。独断，排他，不择手段，不计代价，这一切跟自由背道而驰的丛林哲学，都成了天经地义。目的是争取自由的革命，反倒以不断牺牲自由为代价，以反自由的手段来推动。

但毒果怎么可能开出善之花呢？目的跟过程、目的跟手段怎么可以分开呢？也就无怪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体制往往是反自由的体制。这样的传统革命太可怕，不堪回首。固然如卢森堡所称，革命是人民最后的武器，告别革命的鼓噪过于轻佻。但，我们的确需要一场告别传统

革命的革命。不告别传统革命，普世文明照耀下仍奉行反自由之传统革命，这本身就是对革命的伦理正当性的消解，毋宁说，这本身就是侮辱革命。

新时代的革命，与传统革命最重要的分别在精神上，即它不是反自由的，而以自由为灵魂，以自由为最高尺度去丈量革命，看它的全过程、所有手段、所有细节，是否真的兑现了它所承诺的自由。而所有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是意见市场上质疑革命的自由、批评革命的自由，乃至反革命的自由。如果革命能够充分包容质疑、批评和反对，那么还有什么病变不会被发现？还有什么异化不会被遏制？革命又怎么可能偏离自由于分毫？

这即是说，新时代的革命不是强拆，不是遇到质疑、批评和反对就势不两立，就你死我活。章太炎有骂孙中山的自由，叶德辉有骂农会的自由，辜鸿铭有留辫子的自由，尊重每个人都拥有这样的自由，尊重文明社会的一切自由规则，这本身就是对不自由的传统秩序的反对，这本身就是对传统革命的革命，这本身就是最彻底因而最健康的革命。

回过头来说韩寒。他近日发表了一篇引起巨大争议的文章：谈革命。在我看来，这文章的本意并非反革命，而不过反映了他个人对革命的担心和忧虑，至多不过是对革命的质疑。具体观点有对有错，可批评可反对，但无论批评还是反对，都该就事论事，不能动辄上升到人格，贴上这样那样的标签。

作为一个独立的批评者，韩寒有权批评一切，既有权不留情地批评政府，批评体制，也有权不留情地批评社会，批评革命。批评的对错是一回事，但批评的自由不容置疑。不容批评革命，无非出于一种革命崇拜。这革命崇拜本身就是传统革命情结，就是落后的乃至野蛮的。除了生命和爱，世上没别的神圣可言，革命更谈不上神圣，因为说到底，作为人民抵抗暴政最后的武器，革命不过工具而已。人哪有神化工具、自己拜倒在自己工具面前的道理？

岂止不能神化革命，反而要管理好革命。毕竟革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工具，它是武器，武器可以杀人的，因而是绝不允许失控的。不具备相应管理能力的人，必剥夺其武器。而要提升对于革命的管理能力，没别的法子，只有毫不留情的批评，毫不留情的监督和制约。这就是说，对待革命就应该像对待公权力那样，以防止其作恶为第一原则。在这意义上，当下最需要的是像卢森堡那样的思想家。论对革命的忠诚，论英勇献身，没几人能跟卢森堡比。但论对革命的深刻反思，更没几人能跟卢森堡比。韩寒对革命的批评，仅仅是抛砖引玉，比卢森堡差了

不知几万里。他还需要成长，最好是成长为卢森堡那样的双向啄木鸟：既啄公权力之树，亦啄革命之树。只有当这样的双向啄木鸟愈来愈多，才能把对传统革命的革命进行到底，才能真正开启新时代的革命即实质意义的转型。

而所有这一切，都必须以自由为条件。必须充分自由地聚焦革命的全过程、革命的所有手段、革命的一切疑点，才能保证革命真正向着自由，而不再偏离乃至背叛。

（笑蜀，资深媒体人，曾任《中国改革》杂志执行主编与南方周末高级评论员。原文链接：http://news.ifeng.com/opinion/zhuanlan/xiaoshu/detail_2011_12/26/11567590_0.shtml）

【返回目录】

7-6 杨恒均：革命，还是改良？这不是一个问题！



“当我检讨辛亥革命的时候，我发现改良派没有跑过革命派，于是革命赢了。但革命赢了后，为什么不能把改良派吸收进来，融合革命与改良的力量与智慧，重建国家？”

关于民主素质论，民主与自由之关系等，仅过去两年我就写了几十万字，已经讲透彻了。我今天主要想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如何实现民主？是通过革命，还是改良？是要暴力，还是温和？虽然我已就这个问题论述过多次，也给人主张温和改良的印象，但如果大家注意一下我的用词与表述，就应该清楚，我从来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有些网友看出来了，不以为然，认为我在和稀泥，殊不知，这正是我这些年研究民主、传播与追求民主最有收获的部分。

毫无疑问，我的最高理想是通过温和的改良，波澜不惊，和平过渡到民主自由的政体。我甚至描述了一个让人热泪盈眶的前景：某一天，一位普通的中国人——可能就是你——起床后看新闻才发现，执政党在知识分子、中产阶级与底层民众的压力下，宣布实行民主制度。听到这个消息，你稍微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决定挎上背包，像往常一样出门，等候公共汽车，上班去。就在你等车时，一位街道办事处的同志过来通知你：别忘了下个星期要选举市长哦（也许是总统，你没有全听懂）。你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哦”，继续去上班，下班，做饭，做爱……但慢慢地，你发现，一切都在变化，贪污腐败因为选举而大幅度减少，市长不再能够为所欲为，总统得经常出来向你解释他为什么要征税，他的老婆与孩子干什么工作……你继续上班、做饭、做爱，有时间，还依然会逛逛老杨头的博客，但你已经生活在一个民主的国家。就他妈的这么简单！

这个前景并不是梦，是我来往世界各地感受到的中国和世界的唯一区别。这些年我们几乎在各方面都接受了全球化，唯独在民主一事上，能拖就拖！简单的统计显示，过去 50 年地球

上实行了民主的国家，其中有绝大多数的民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不知不觉地进入到民主的时代。我希望这样的场景在中国重演，但我却依然不会也不能对革命与改良来一个泾渭分明的选择，不是因为我没有立场，更不是因为我墙头草、没有理想，当然也不是因为我搞不清这两者的概念与关系，而是民主政治 300 年的历史告诉我一个铁的事实：任何一个国家民主的到来，都不是靠单一的革命或者改良能够实现的！

世界上最早的三个民主国家——英、美、法，几乎都伴随着血腥的屠杀与战争，这是不争的事实。常常有中国学者拿英国的民主化来贬低法国大革命，认为温和比激烈好，但他们忘记了英国革命把国王都杀掉了，前后死的人并不少，而且，现在的英国民主就一定比法国的强？这可能是连英国人都不敢承认的吧！

除了这三个原生民主国家之外，后来民主的到来，不是伴随战争，就是依靠政变与颠覆，都少不了某种意义上的"革命"。这些都不是秘密，大家翻看一本大学历史课本，就都清楚了。1949 年后，中国政府主导的宣传过分宣扬革命，伤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心与身体，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抹杀革命在世界民主化中的作用啊。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最近 20 多年来的民主化，血腥味越来越少，革命开始褪色，这也是一个事实。造成这一事实的主要原因是民主理念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优势，民主价值变成普世价值，世界大潮，浩浩荡荡，势不可挡，自然很多人就不愿意去阻挡历史潮流，成为历史罪人。而且，民众也觉醒了，这个尤其重要。

我曾经和网友有一个很有趣的对话，网友问，你为什么反对暴力？我说，民主是每个人为自己作主，如果他们不愿意为自己作主，我为什么要去搞暴力，为他们争取民主？另外一个网友紧接着问，那英国革命、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呢，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呢？我说，我不但坚决支持，而且，如果我活在那个年代的话，我也会走上革命暴力之路，去争取民主。结果，网友一起问：为什么？我说，很简单，那时候，地球上没有几个民主国家，民众几乎都不知道民主的好处，你等他们觉醒，等到猴年马月？革命吧。建立一个民主制度（也可能像两千年一样，建立另外一个独裁的制度），让他们掌握、运作与喜欢，从而推广到世界各地！

这就是为什么，越早实现民主的国家，暴力革命的色彩越重，而后来的，包括苏联、东欧的瓦解，尤其是中国台湾的变革，几乎都成了改良的典范。可是，即便是改良的典范，就真的



告别革命了吗？就拿世界上最和平、最温和的中国台湾来说，我们现在推崇蒋经国先生放松权力、从善如流，可如果没有美国人的压力，没有从雷震时代的自由知识分子们的冒死奉献，到党外人士、民进党的前仆后继，你真认为国民党会甘心放弃权力，建立一个光辉的改良的典范？如果你看看当时国民党关押了多少人，驱赶了多少人，让多少人妻离子散，甚至暗杀了多少人，你能说台湾的民主力量、党外人士与民进党当时进行的不是一场争取民主的"革命"？

还有前苏联的例子，更是革命与改良的完美结合。苏联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帝国，也是我们认为无论靠革命，还是改良都无法毕其功于一役的专制帝国——这也恰恰是当时没有一位美国专家能够预测苏联会垮台的原因，因为每一位专家都认为革命无法摧毁一个靠革命建立并在继续革命的政权，而这个政权更不会改良，他们却忘记了：革命与改良一起进行的话，哪怕都不彻底，却可以达到单独靠革命或者改良都无法企及的目标。

正是在苏联这个大帝国里，我们看到改良派戈尔巴乔夫在以改革维护党的统治，而民主派却在关键的时刻发动群众冲上街头，进行了革命和政变——虽然最关键时刻只有大约一千多人占领红场。但你能设想如果没有这一千多人，共产党的书记叶利钦有胆量站到坦克上，从改良派一步登上革命派？苏联会解体吗？——看看戈尔巴乔夫这几个月的讲话，他从来没有想过实行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民主。

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是革命还是改良？我会告诉你，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你是否真正希望实现民主？你的目标是不是实现民主？如果是，所谓革命还是改良，只不过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可现在的问题是，对实现一个目标手段的争论，远远掩盖了对这个目标的讨论与认识。而且，让很多根本不赞同这个目标的人跳出来浑水摸鱼，闹得不亦乐乎。

有一件让我郁闷的事就是，如果我们都有一个大目标——实现民主，我们为什么还要为如何实现来争论得反目成仇？甚至影响到对目标的认识与追求？我个人认为，有了大目标，大家各人按照自己方式方法走过去、跑过去，或者把它拉过来就行了。你可以开车不用打远光灯，并关心社会、嫉恶如仇。乌坎的民众显然一部分还没有钱买车，另外一部分即便把车灯全部关掉，土地照样拿不回来，于是他们只好采取另外的方式争取个人权利、呼吁民主。而我呢，依然每天在这里写写画画，以"提高自己和读者的民主素质"为己任……





别以为我这样选择是一种无奈，你睁眼看看当今的地球，有几个国家民主的到来，是以任何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人可能会举例说曼德拉如何和平与伟大，你知道曼德拉时代的抗争，牺牲了多少黑人吗？再说，有哪一个人成功预测了第二波民主化何时开始，第三波民主何时到来吗？有哪一个民主是一帮人讨论用什么手段并得出结论后才争取到的？

当然我不反对大家表达自己的观点，我只是反感有些要争个输赢的做派。现在让我们假设争论革命还是改良的人终于分出了胜负，结果会如何呢？让我们先假设革命派赢了，那么，你准备什么时候革命？在当今世界与现实中，你连自己的家门都出不了，你真有胜算？你想发动谁，又想让谁打头阵去为你争取的伟大事业牺牲？你的那些主张而不是行动只不过给当权派以镇压的借口。

其次，让我们假设改良派大获全胜，革命派都被抓起来，或者被赶走了，兄弟，你看到地球上一百多个民主国家，有哪一个是在没有一点"革命威胁"情况下自动走上民主道路的？你丫的就别天真了，好不好？

革命与改良，在中国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可我到了西方才发现，这个问题早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你可以说他们已经不用再选择手段，因为目的已经达到，可这不过是一部分原因而已，他们尊重事实与实际情况，所以，有的等到你自己垮台，有的则会出兵，可谓暴力与改良兼及。在中国，这个却成了问题，非此即彼的问题。

这可能是我们民族在追求民主上犯下的最大错误。当我检讨辛亥革命的时候，我发现改良派没有跑过革命派，于是革命赢了。但革命赢了后，为什么不能把改良派吸收进来，融合革命与改良的力量与智慧，重建国家？历史不能重写，但未来总可以幻想吧，为什么还是非此即彼？

受到非此即彼伤害最大的恰恰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因为在这种大有你死我活的争论中，我们消耗掉的是自己。更可悲的是，一些主张革命与暴力的"民主派"，我并没有看到他们对当权者使用了什么"革命"手段，倒是看到他们对改良派不停地使用暴力的语言，招招致命（我个人就曾经是最大的受害者）；而有些改良派也好不到哪里去，没有看到他们对当权者是如何改良的，倒看到他们总是不遗余力地试图按照当权者的意愿来"改良"那些革命者。



各位，我常常怀疑这些人是否真的相信民主，以及追求的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否则，他们为什么老把自己的主张与力量使错了地方与方向？难怪，最后有人得出了不言而喻的结论：哈，你们看看这帮谈论民主的家伙，看起来，还是维持现状比较好嘛。至少维持现状的话，你们就不会为革命还是改良而争得死去活来、势不两立了！

好在还有人搞得清楚，至少杨恒均搞得清楚，他的读者也应该搞清楚：我们义无反顾的追求一个公正、法治与民主的中国，我们理性温和，希望上下协力，共同让民主到来，让中国崛起。但如果总有一小撮利益集团誓死捍卫反人类与反中华民族利益的不民主制度，试图阻挡历史的潮流，我们一定会让他灭亡！

我的发言完了，如果还有不明白，求你看一下我过去一年多写的几十万字有关民主的论述，好不好？

新年快乐！

（杨恒均，知名作家，时事评论家。原文链接：http://www.chinareform.net/show.php?id=4829）

【返回目录】





7-7 周濂：革命的窄门



“现代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通过革命的门是道窄门，上头写着‘自由’二字，谁不从这道门走，谁就会坠入革命的泥沼，成为被革命吞噬的儿女。”

一、革命还是造反？

或许是中学语文教育太成功，闲谈中只要一提“革命”二字，我就条件反射地想接“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在阿 Q 看来，革命就是造反。造反当然是件坏事，但如果能让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害怕，甚至可以因此上秀才娘子的象牙床上滚一滚，坏事也就成了好事，不妨“同去同去”。

阿 Q 的革命观很黄很暴力，很傻很天真。但这事不能怪他。1895 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和陈少白逃到日本神户，看见当地报纸称“中国革命党孙逸仙”云云，醍醐灌顶，遂有陈少白如下的自省：“我们从前的心理，以为要做皇帝才叫‘革命’，我们的行动只算造反而已。”史学家怀疑这段回忆的可靠性，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革命党人最初也同阿 Q 一样，搞不懂“革命”和“造反”的区别在哪里。

查文献可知，“革命”一词语出《周易.革卦.彖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革命”虽然包含“顺天应人”的天命思想，但在传统中国社会里，成王败寇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革命”就像“孤家寡人”，惟有黄袍加身才有资格使用，失败者或者图谋者都只是“叛乱”或者“造反”。孙中山和陈少白最初也囿于传统的话语积习，对自己的行动无以名之，只能自视造反者。日本人唤醒了他们对于汤武革命的原始回忆，拓宽了对革命的想象力，认识到不是惟有继任大统者有资格自称革命，因受天命就是革命，而且，革命除了暴力造反，还可以用



来泛指一切变化和变革，尤其是制度的变迁和观念的革新，自此“革命党人”才成为孙中山及其同仁的自我认同。

革命不是造反。经过革命党人的自我正名，再经过共产革命的洗礼，革命一词本已具有绝对的政治正确性。但事实上，在政治领域内革命仍旧是当权者的垄断话语，“只有做了皇帝才可以说革命”的隐形典律仍然禁锢着普通人的心理。所以普通中国人一听到革命，还是会立刻想到造反，立刻想到暴力，立刻想到野心家，立刻想到乌合之众，立刻想到无政府，立刻想到血流成河，中国人的革命想象力从来都是阿 Q 模式的改造版和升级版。

1911 年 10 月 14 日，也即武昌起义第四天，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以“中国的造反”（The Rebellion in China）为题报导，形容这次起义是“最近的也是最危险的一次中国不满情绪的爆发”，称时人“对以反满为特征的这次造反（rebellion）……怀有巨大的恐惧”。发人深省的是，21 天过后，也就是 11 月 4 日，《经济学人》再次报导武昌起义后续新闻时，标题已然改为“中国的革命”（The Revolution in China）。前后口径之所以发生如此根本的转向，不是因为英国人承认了武昌起义的正当性，而是因为这场“造反”倒逼出了满清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度变革：“目前为止帝国的宣言和承诺可以确保这一点，中华帝国的历史新起点已确然无疑地到来了。满清政府及其支持者承诺进行直接和彻底的政府组织改革……”

在《革命的时代》中，霍布斯鲍姆称自 17 世纪以来的西方全球化扩张是借助于一辆“双轮马车”，以两种革命模式——1688 年的英国光荣革命和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为动力。当《经济学人》称“西欧将真诚地祝愿袁世凯和制宪议会获得成功”时，显然是以光荣革命作为摹本。武昌起义在他们的笔下仍旧是“造反”或者“叛乱”，他们肯定的中国革命是自上而下的制度革新，“由有着特定目标的中上层提出更换政府的要求”，这才是英国人所理解的革命（revolution）。显然，英国人所理解的革命不是造反，更像是改革，甚或干脆就是复辟。



二、革命还是复辟？

阿 Q“革命”失败，临上法场前，站在囚车上颤颤巍巍喊：“20 年后又是一条好汉！”20 年一个轮回，阿 Q 知道这是古往今来好汉就义前的经典台词，他不知道的是“轮回”本就是西文革命（revolution）的原义。

革命最初是天文学术语，意为“持续不断地旋转运动”。哥白尼名著《天体运行论》的英文译名即为“On the Revolutions of the Heavenly Spheres”。按阿伦特的解释，革命在此强调的是非人力所能影响的、不可抗拒的、有规律的天体旋转运动，它与暴力无关，也与新旧之别无关。

17 世纪开始，革命从自然术语变成政治术语。有趣的是，第一次被称为革命的政治运动恰恰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革命，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复辟：1649 年查理一世被推上断头，此后的十年里英国一直是共和政体，但革命并不是指称这一时期，而恰恰是指克伦威尔去世后，查理二世被迎回英国，乾坤复位的那一刻。1688 年，革命这个词再度被提及，同样不是为了欢呼詹姆士二世的落荒而逃，而是颂扬威廉和玛丽的荣登王位。也正因为此，阿伦特说光荣革命“根本就不被认为是一场革命，而是君权复辟了前度的正当性和光荣”。英国人相信他们远久到无可考证的宪政传统和自由传统是如此值得珍惜，所以任何一次短暂中断之后的回归都值得额首称幸、大加赞美。

革命一词的原义是复辟！对于今人来说，这个语义学上的再发现实在需要一点想象力才可以接受。我们通常理解的革命，不是向后回溯，而是向前瞻望，不是回到过去，而是去向未来。阿伦特说要理解革命的现代意义，“我们必须转向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但与此同时，她又警告我们说：“必须考虑到，在两者的最初阶段，参加者都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恢复被绝对君主专制和殖民政府的滥用权力所破坏的和践踏的事物的旧秩序。他们由衷地吁求希望重返那种事物各安其份、各得其宜的旧时代。”

“各安其份、各得其宜”这八个字让我们怦然心动，柏拉图对正义的理解不也正是如此——城邦的正义就是生意人、辅助者和护国者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反之，当三种人不安于室，试

图扩大自己的领地，僭越彼此永恒固定的界限时，正义就堕落为不义。米什莱在《法国革命史》中说："什么是大革命？这是公正的反抗，永恒正义的为时已晚的来临。" 归根结底，无论是以复辟旧世界为己任的革命者，还是以创造新世界为宗旨的革命者，基本逻辑都是一样的：为了实现所谓的永恒正义和秩序。

哥白尼的"革命"虽然仍取"持续不断地旋转运动"的古义，但有一点极富现代性，它彻底颠倒了太阳与地球之间的主次关系，现代革命正是意在通过上下颠倒旧秩序来实现新正义。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大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答案："这场革命的效果就是摧毁若干世纪以来绝对统治欧洲大部分人民的、通常被称为封建制的那些政治制度, 代之以更一致、更简单、以人人地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秩序。"

胡风在 1949 年 11 月 12 日夜 11 时改定的长诗《时间开始了》，有这样一句：

时间！时间！

你一跃地站了起来！

毛泽东，他向世界发出了声音

毛泽东，他向时间发出了命令

"进军！"

"时间开始了"，这个说法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现代"革命"的本质属性：革命不是在一个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漩涡里沉浮，而是挣脱出来，跳跃出来，讲述一个从不为人所知、也从不为人所道的新故事。从此，现代革命就不再是复辟，而是开创新世界，打造新人民。革命意味着时间开始，意味着开端，就像耶稣降生，他打破了古代的时间概念，

三、革命与人民

现代革命就像一个魔咒，叫醒了沉睡中的人民，这是一个全新的政治族群，它曾经是臣民，是子民，是狗苟蝇营的乌合之众，是目光短浅的穷老百姓，但是革命让他们脱胎换骨，他

们开始跃跃欲试，摩拳擦掌，他们被告知并且相信法律来自于他们的意志，任何强力要想成为合法的权利都必须获得他们的认可。

法国大革命第一次真正叫醒了人民，也正因为此，法国大革命一直被视为是现代革命的模板，革命的善与恶、黑和白都可以在法国大革命这个大熔炉中找到它们被烧变形的残渣。

可是如果我们拓宽革命的视野，就会发现发动革命其实并不一定要叫醒人民，至少不用叫醒所有的人民。

比如英国的光荣革命本质上就不是人民革命，而是托利党人、辉格党人和威廉之间的三方势力角力与妥协的结果。伦敦的市民曾经上街游行抗议詹姆士二世，但是人民并未登场亮相。英国传统思想中虽有“诛暴君论”，认为“暴君是人民公敌，诛暴君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正义的。”但即使是激进的辉格党人，大多数人也对暴力持反对态度，认为改善宪法和或扩大臣民自由无需采取反抗行动，即使反抗也只能有上层人物进行，而不是发动一般民众。

美国革命最初也没有唤醒大多数的民众。独立战争前，15-30%的殖民地人民主张保皇，近一半的人不置可否，余下的一小部分坚持战争。美国国父中的绝大多数都对宗主国的制度文化怀抱善意和尊敬，富兰克林常驻英国，直到最后关头仍在谋求避免革命的可能。结果呢，谁赢他们跟谁。

所以革命无需唤醒所有人。辛亥革命就没有叫醒阿 Q，辛亥革命还是成功了。事实上，综观历史你就会发现，革命会否爆发，人民是否准备好了是个伪问题。而革命爆发之后诞下的究竟是龙种还是跳蚤，人民是否准备好了是一个半真半假的问题。

说它是一个半真的问题，是因为在人民尚未真正理解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真义时赋予人民太过崇高的权力和地位，将会释放出堪比长岛原子弹一样恐怖的能量。法国大革命的确唤醒了人民，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民也的确没有完全准备好，所以才会在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时期，至少 16594 人因反革命罪而丧生断头台。毕希纳在《丹东之死》中描写的场景虽富戏剧感，但绝对真实：

市民们纷纷高呼：“谁能念书认字，就打死谁！”，“谁想溜走，就打死谁！”，“他有擤鼻涕的手帕！一个贵族！吊到灯柱上！吊到灯柱上！”，“什么？他不用手指头擤鼻涕！把他吊到灯



柱上！”然后，那个卢梭的信徒、道德纯洁到与死神一样“谁都无法收买”的罗伯斯庇尔登场了，面对一片打死他、打死他的叫嚷，他的回复是：“以法律的名义！”市民反问：“法律是什么？”罗伯斯庇尔答：“法律是人民的意志。”市民答：“我们就是人民，我们不要什么法律；‘所以’我们的这种意志就是法律。”从这个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的场景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千万不要相信人民！在人民尚未准备好之前，不要发动人民！

在政治体的意义上，现代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民主制。然而，就像解放不一定带来真自由，革命也不一定带来真民主。民主质量的好坏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是否准备好了。可是问题的另一面在于，人民只能是被其制度的性质所造就的那个样子，如果各种犬儒主义和政治冷漠恰恰是这个制度所造就的结果，那么不改变制度，就不可能真正激发和培育人民的民主精神和公民德性。认为革命要想收获龙种就只能坐等人民完全准备好了之后，就像是告诫一个从来没有下过水的人千万不要游泳，因为你还不会游泳，这难道不是一件很滑稽的事情吗？

四、诉诸价值而非仅仅诉诸利益

两个鞋商到非洲考察，一个回来说：没戏！那里的人从来不穿鞋！另一个人则说：有戏！那里的人从来不穿鞋！悲观者的根本问题在于现实的，太现实的，最终一路滑向“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这个大俗套。革命总是需要一点点乐观主义精神的，否则何来革命乐观主义这个词语？现代商业社会里，很多需求是被创造出来的，创造需求就是创造商机；现代政治世界中，很多观念也是被改变过来的，改变观念就是改变世界。

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可知，当时法国人民服从统治者是出于习惯而非出于意愿，这是一种坏的服从，除此之外，还有出于恐惧而非出于意愿的服从，以及出于利益而非出于意愿的服从。出于习惯的服从是真睡，出于恐惧的服从和出于利益的服从则是装睡，前者被迫，后者不但心甘情愿可能还暗自窃喜。三种服从的可能中，出于利益的服从最糟糕，因为真睡可以被叫醒，被迫的假寐有一天会忍无可忍，而心甘情愿的假寐却永远都无法被叫醒。利益之争的确可

以引发革命，但惟有价值之争才真正成就革命。因为只要还停留在利益之争的层面，就是可以用人民币收买的人民内部矛盾，而一个可以被收买的民族就不值得拥有革命的果实。

观念的塑造和改变绝非一日一夕之功。独立战争前，美利坚的人民已经在过去的 150 年里逐渐培育出了基本的权利意识和自治精神。独立战争前，大不列颠帝国颁布的《糖税》、《印花税法》只是温柔一刀，与苛政猛于虎毫无干系，殖民地人民的生活也未到水深火热的程度。今天的美国青年谈及独立战争时，总是万变不离其宗地说："都怪税太多！"事实上，当时的革命者只是借税收在说自由，是自由陷入了危机，而不是财产陷入了危机。对他们来说，"说财产就是说自由，恢复或捍卫一个人的财产权利，就等于是为自由而战。"

在相当意义上，美国革命乃是一场没有直接压迫的革命，它基于的是一个被夸大了的暴政想象，以及一场被放大了的自由危机。看看下面这些话就会明白这个道理："如果他们有权利向我们征收一便士的税，他们也就有权利向我们征收一百万的税，"，"那些未经自己或其代表同意而被征税的人乃是奴隶。"，"我们自由的太阳进入幽黑的云层，一时带来了漫漫长夜的不祥之兆。"。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对于自由的迷狂不仅是声嘶力竭的革命宣传，而是深深改造了每一个普通人的基本信念。据说一位参加过康克德之战的革命老兵，在耄耋之年接受采访时承认自己压根没有见过什么印花税票，也没有体会到茶税对日常生活的任何影响，他之所以参加独立战争，只是因为"我们一直是自由的，我们也想一直自由下去，但他们却不想让我们这样。"诉求价值而非利益才是美国革命之道。

1793 年路易十六里通外国的文件被发现，愤怒的法国人把他们的国王投进巴士底狱，据说在夜阑人静的时候，路易十六感慨说："是这两个人打垮了法国。"这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伏尔泰，一个是卢梭。文人也许会在刺刀见红的革命中曝尸街头，也许会在尔虞我诈的政治角逐中注定头破血流，但是你无法否认的是，归根结底，改变观念就是改变世界。

五、革命的三位一体难题

自由和平等，再加上一个若有若无时隐时现的博爱，是启蒙运动遗留给现代革命者的新三位一体难题。

启蒙运动之前的英国革命完全忽略了平等，只讲自由。启蒙运动之中的美国革命强调自由，偶尔兼顾平等。法国革命初期崇尚自由，最后彻底倒向平等与博爱。面对这个新三位一体难题，每一次革命都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也决定了各自的命运。

今人谈论革命，常拿民主和平等来说事，其实民主和平等均非革命的终点，自由才是。或者不如这样说，任何不以个体自由和个人权利为最高标准和最终鹄的的革命注定会是一场灾难。

1792 年，当面临外敌入侵的危险时，丹东拯救了法国大革命，然后他就厌倦了。史学家说丹东的懒惰和厌倦是“他的、也是法国的不幸”。突如其来的厌倦，厌倦革命，厌倦像“上帝的宪兵”那样以道德的名义杀人，厌倦每天早晨起床，厌倦可怜巴巴的乐器弹出来的永远只是一个调子，丹东说：“我想把自己弄舒服些”。好吧，你说这是任性，我说这是人性。

丹东与罗伯斯庇尔的最后决裂，归根结底，是日常伦理与圣人道德的决裂，是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决裂，是任性的自由与神圣的平等的决裂。

在把丹东送上断头台后三个月，罗伯斯庇尔也站在了断头台前，在最后的演说中，这个像死神一样收买不了的罗伯斯庇尔，终于明白了什么，说：“我们将会逝去，不留下一抹烟痕，因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错过了以自由立国的时刻。”阿伦特总结说，在错过了这个“历史性时刻”之后，“革命掉转了方向，它不再以自由为目的，革命的目标变成了人民的幸福。”

人类的愚蠢在于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蹈覆辙。1986 年，哈维尔写道：“捷克斯洛伐克整个社会陷入了深深的麻木状态之中。面对重新确立的极权体制，大多数人放弃了自己的努力，不再关心国家大事，逃避现实，钻入自我的圈子。人们不再相信公民的意见或公开的对抗有什么作用。为了证明这一点，法庭对那些持不同政见、提出异议的人进行严厉的制裁。社会涣散成一盘散沙。自由的思想和创作陷入了自我的圈子，从中寻找隐蔽所。公民的自由组合、交流创造

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现在却被禁止了。全国上下笼罩着一种死气沉沉的气氛。一切向钱看的生活充斥着整个社会。……人们变得自私起来，到处都笼罩着恐惧。人们被迫对生活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表面上顺从，内心里却什么也不相信。”

看着很眼熟？那就让我们再来看看这段话；“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别误会，这是托克维尔在评论 19 世纪中叶的法国。

在现代背景下，真正的革命既不是造反，也不是复辟，真正的革命意在打造一个有别于现存制度的新秩序，阿伦特说，衡量这个新秩序的最高标准既非正义也非伟大，而是自由。关于这一点，比阿伦特早上 100 年的托克维尔表示认同，他说：“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能变得富裕、文雅、华丽,，甚至辉煌，但是我敢说，在此类社会中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 因为，“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

面对自由、平等与博爱这个新三位一体难题，罗尔斯在《正义论》中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最大的平等自由权原则呼应自由，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呼应平等，差别原则呼应博爱。字典式的排序原则保障了自由的优先性。因为只有以自由而非平等、博爱为第一原则的民主社会才有可能培育真正的公民德性与尊严。

以革命的名义，远的有英国光荣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近的有俄国革命，辛亥革命，乃至天鹅绒革命和各种颜色革命，革命的模式看似争奇斗艳，革命的大道看似宽阔无比，但是，现代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通过革命的门是道窄门，上头写着“自由”二字，谁不从这道门走，谁就会坠入革命的泥沼，成为被革命吞噬的儿女。

（周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原文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d6cc1df01011sjc.html）

【返回目录】



【洞见专栏】

汪吕杰：百年前的那场革命：辛亥的失败与成功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却没有建立一套新的完善的制度来行使权力，进而导致了政府的滥用权力，社会财富的集中，以及广大农村地区的被忽视。在这个层面上，辛亥革命是失败的。”

辛亥百年刚刚过去，但对于百年前的那场革命的反思与研究值得继续关注——在今天的中国，有关“革命”的话题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美国学者德里克和普拉兹尼亚克在新近一期的学术期刊《中国信息》上撰文，对辛亥革命做了一个总体的得失评价。在他们看来，辛亥革命既是终点，也是起点；既是失败的，也是成功的。

在文章的开头，他们引述了另一位美国学者周锡瑞 (Joseph Esherick）的话，“辛亥革命不仅仅是一种失败，而且让中国处于比满清时期更糟糕的处境。”

众所周知，辛亥革命结束了满清王朝将近三百年的统治。那为什么辛亥革命在结束帝制，具备如此重大历史意义的同时，却被广泛视作一场失败的革命？甚至连孙中山本人也认同革命的失败，随后致力二次革命，并采用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形式以表达自己的这种不满。

这背后的原因根植于“革命”的定义。两位学者认为，将革命与政变、暴动、反叛，乃至不正常的日常行为区分开来的关键在于：革命承诺将现有的社会政治秩序沿着一个激进的方向，进行一个极大、极深的改变。具体到辛亥革命，当时的革命者虽然对这个具体的方向有争论，但不可否认的基本原则是：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保障平等、公正、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以及更好的福利等权利。但是，这些只是一些基本的原则，甚至可以被归于“空想”。



在当时，也就是清王朝末期，中国社会远远没有产生一个完善的革命组织和一套自恰的革命理论。这根本上导致了辛亥革命在偶然发生之后，政权迅速滑入旧有的清王朝官僚体制中。辛亥革命虽然摧毁了帝王专制制度，却没有摧毁专制制度的基础，即地方主义以及地方精英。相反，新建立的中华民国不仅"发扬"了区域主义，政权更是被地方精英所控制。这些本被革命所打倒的对象却在民国时期以新的面目重新出现，进而执掌国家政权，甚至逼迫孙中山重新成为反对党。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却没有建立一套新的完善的制度来行使权力，进而导致了政府的滥用权力，社会财富的集中，以及广大农村地区的被忽视。在这个层面上，辛亥革命是失败的。

同时，辛亥革命在破坏了满清王朝所维持国家基本统一的局面之后，不仅未能及时实现国家的富强统一，更是将中国送入军阀混战之中，当时的局势甚至比满清时期更差。

但是我们又需要反过来想想，辛亥革命真的如此失败吗？任何一场革命的初始目标和它确实带来的事实本来就存在差距。

辛亥革命虽然未能统一全国，却造就了某些不可逆转的趋势，比如说共和：即使权力之大如袁世凯，也无法扭转此趋势。

同时，各地的军阀一方面通过战争伤害整个国家，另一方面却也是各自地区最大的现代化推动者。军阀的行为虽然阻碍了国家的统一，但这却不能否认他们革命者的身份。同时代的日本历史学家们曾认为，军阀时期的联省自治有可能为中国带来一种新的民主。

而且，辛亥革命导致了一种新的关于"公民"的理念壮大。"公民"这一理念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扭转为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并将此发展为政权合法性的新的来源。如果我们将公民社会理解为所有公民都有权参与公共事务，尤其是政治事务，那么满清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过度依赖皇族和地方士绅，无法将公民社会纳入到旧有的王朝体制中。而民众对公民权不可遏制的争取催生了革命，革命也反过来促进了公民社会的成长。

从这些角度出发，辛亥革命不仅不是一场失败的革命，反而是中国在二十世纪一系列社会变化中的高潮。它所指明的方向，既包括国家的富强，也涵盖了公民权的实现。1928 年国民党

的统一全国，1949 年新中国的建立，1978 年开始的改革开放都可看作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后续。只要这些目标没有被充分实现，中国社会的努力也就不会停止——正如作者所指明的，充分的公民权到现在也未能在大陆完全实现。

总体来看，这并不是一篇具有完全新意的文章，它的意义在于为我们这些依然带有强烈历史立场的公民们指明了辛亥革命作为一场所带给中国的意义。如果我们将革命、改革、改良之类的词汇去除某些成见，我们会发现，形式其实并不重要，只要准备充分，再加上人类普遍原则的指导，任何形式的改变都会将中国带向一个正确的方向。但如果指导原则出错，或者盲目行动，无论是最缓和的，抑或是最激烈的，都将给中国带来一些无法预知的问题。

参考文献：Arif Dirlik, Roxann Prazniak, “The 1911 Revolution: An end and a beginning”, China Information 25(3), pp.213-231.

（本专栏由“政见”团队供稿，http://cnpolitics.org/）

【返回目录】



【FMN 新闻】

2012 台湾大选

台湾大选获得大陆网友强烈关注，马英九、吴敦义 1 月 12 日上午会见外国媒体并回答问题，媒体们此次主要聚焦两岸关系问题，马英九表示若连任没有计划访问中国。

新闻：http://fmn.cc/zB0RlD

1 月 14 日，台湾"总统/副总统"及立委选举拉开帷幕，全台民众自当日早上八时进行投票，至下午四时截止。之后经过数个小时的计票工作，最终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和吴敦义当选。

新闻：http://fmn.cc/zcTIPw

http://cn.fmnnow.com/?p=1627

14 日晚间，选举结果公布之后，马英九发表了胜选感言，表示将倾听各界声音，并让**台湾**人民更有尊严的遨游世界，蔡英文和宋楚瑜则发表了败选演讲，尤其是蔡英文的演讲引发了大陆网友的关注，她表示执政党需要监督，为对选举结果负责，她亦辞去了党主席的职位。

新闻：http://fmn.cc/vZH0vz

http://fmn.cc/zDS2QD

FMN 独家的**台湾**大选当日图集，包括 14 日多位台湾政要以及所有"总统/副总统"参选人的投票情况，投票结束后的计票情况，以及当日晚间国民党总部的造势活动情况。

新闻：http://fmn.cc/A1gsdN

2012 年春运

春运火车票一票难求，一名网友为从天津回到位于新疆伊宁的家乡，只能 5 天换 5 趟火车"曲

线回家”。对于备受诟病的网购系统，**铁道部**则称 12306 网上售票系统十多年前在美国获信息技术奖，还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新闻：http://fmn.cc/zaRA1S

http://fmn.cc/z5Ix4s

杭州火车南站员工被曝同黄牛合作，私带无票人员乘车，黄牛甚至表示实名制后，生意更好做了。这一消息引起了杭州南站的回应，称违规人员是临时工，还认为媒体报道该站工作人员行为的做法不严谨。

新闻：http://fmn.cc/wsOdbo

http://fmn.cc/zTiXLu

中国自 1 月 19 日起将迎来春运客流最高峰，今年全国客运量将达到 31.58 亿人次。而作为主要出行工具的铁路订票实在困难，**铁道部**的购票网站还对登录用户数和提交订单用户人数设置了上限，导致用户访问更加困难。

新闻：http://fmn.cc/xlHYT0

http://fmn.cc/wbnOYr

中国经济

近来中国的东中部地区陆续公布了 2012 年经济增长预期，数据显示，这些经济发达省市普遍调低了预期数字约在 8%-8.5%左右，研究人士认为**中国**整体经济增速还会有所放缓。

新闻：http://fmn.cc/wCJkrY

1 月 17 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 2011 年国民经济数据，数据显示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 9.2%，城镇人口超过农村，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 23979 元。居民消费价格则比上年上涨 5.4%，中国的总人口性别比为 105.18。

新闻：http://fmn.cc/z3hGky



国家统计局 1 月 17 日公布了 2011 年中国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是 0.3897，局长称因高收入阶层收入不透明使基尼系数偏低因此没有发布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还说需要时间要将统计数据衔接好。同时统计局还表示对 2011 年前两个季度 GDP 环比数据进行了修正。

新闻：http://fmn.cc/xfPSrV
http://fmn.cc/yUA7oW

有消息指南方某省高达千亿的**地方养老金**获批在今年一季度进行投资，其中三到四成将投资股市，并用于提振股市和债市。这一消息引起了股民和投资者的关注。

新闻：http://fmn.cc/x1nbnn

国家统计局 1 月 18 日发布的 2011 年全国人口年度抽样数据显示，中国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自 2002 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人口学家指出，这标志着中国人口结构出现根本性变化，人口红利消耗殆尽。

新闻：http://fmn.cc/yCrcsc

中国各地罢工事件

本月伊始富士康**武汉**工厂被指同 150 多名工人发生劳资纠纷，部分员工曾扬言集体自杀，目前据称事件已平息，不过有 45 名员工已离职。

新闻：http://fmn.cc/zHDSxQ

2012 年一月以来中国各地罢工事件不断，而从 1 月 13 日起因不满长安集团转移生产资质，**江西景德镇**的昌河汽车数千职工开始罢工，直到 17 日长安联合景德镇政府发通告称昌河生产资质、生产基地和品牌维持不变，以回应员工的诉求。

新闻：http://fmn.cc/wC7gmO
http://fmn.cc/wElAlo

2012 年 1 月 17 日**广西南宁**日资丰达电机公司八千工人为争取自身权益发起罢工，不过 1 月



18 日厂方最后同意发放 250 元人民币的年终奖金以平息工潮。网友表示由于厂内工人绝大部分是女工，未发生肢体冲突。

新闻：http://cn.fmnnow.com/?p=1631

无独有偶，同样在 17 日**徐州**美驰工程机械车桥制造公司的工人因不满公司种种条款的苛刻要求，以及工资待遇极低，发起了罢工行动。18 日晚间，员工同公司领导进行了谈判，但是领导提出的条件没有被员工同意，因此事件仍在继续。

新闻：http://cn.fmnnow.com/?p=1634

其他重点新闻

中国艺术家**艾未未** 1 月 15 日在推特说：“昨晚被朝阳区南皋派出所传唤，传唤理由是涉嫌围攻摄像头。”他还在另一推文上表示凌晨 4 点半才从派出所回家。据悉草场地 258 号周围被警方安装了多个监控探头，而此番被传唤的理由引起了网友的不解。

新闻：http://fmn.cc/wEHsRm

推特创始人访华，在上海却发现无法访问推特，引发了包括艾未未在内的网友们的关注，大家进行了有趣的交流。同时有调查显示，中国网民数量已达 5.13 亿，其中近半网民使用微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 1 月 18 日对网络实名制发表看法，称此举是为了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也是顺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呼声”。

新闻：http://fmn.cc/y8NxAN
http://fmn.cc/zQNU7X
http://fmn.cc/wSRopf

贵州原政协委员黎庆洪涉黑案审理中律师因为抗议法庭审理程序违法，被法官宣布逐出法庭，这位著名律师当庭气昏厥被送进医院，目前该案已有 4 名律师被逐出庭，庭审中还使用方言，存在多处不合法的情况。

新闻：http://fmn.cc/yyNzBi



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近日接受访问时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发表了看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1 月 18 日罕见的对这一话题做出回应，还称“大多数中国人对国家的发展感到满意”。

新闻：http://fmn.cc/xepxhA

1 月 15 日**广东汕头**市长在一次会议上谈及海门镇居民因反对建造电厂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认为“少数人受外媒影响，居心叵测，这些人是非抓不可”。此前有不少群众因参与抗议活动而被当地警方抓获。而原本刊载这一新闻的网站将此消息删除，我们保留了截图。

新闻：http://fmn.cc/yXQ25e

1 月 15 日下午的消息，**广东省乌坎村**领导者林祖恋被任命为该村的村党委书记。此前乌坎村村民对村内换届选举和土地问题存在不满，村民发起了长达数月的抗议事件并引发了海内外的关注。

新闻：http://fmn.cc/ybIS3F

2011 年**渤海**湾的溢油事件仍在影响着渔民，导致今年贝类养殖户收成仅有一二成，受损的养殖户自发维权并向康菲公司追讨损失。亦靠渤海为生的山东渔民称渤海正慢慢瘦死，30 种海货因环境污染绝种。

新闻：http://fmn.cc/w9Xe1S

http://fmn.cc/zo08VM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1 月 18 日下午 15：30 在金华市中院宣判，浙江亿万女富豪吴英案二审维持死刑原判。据记者透露，昨日律师突然接到通知要求赶往法院，但法院一直不告知何事。有网友表示此次突然宣判可能为避免记者蜂拥而至采访。

新闻：http://cn.fmnnow.com/?p=1605

http://fmn.cc/yXszEv

1 月 16 日，**上海**静安区 11•15 大火案中的受害者来到上海市政府和静安区政府门前，拉起横



幅，上书“无家可归的上海 11•15 特大火灾灾民向各界领导拜年”。这一举动引起了数万网友的关注。

新闻：http://cn.fmnnow.com/?p=1607

一款高达 9999 元且专门面向**领导干部**的“红派壹号”平板电脑，因可能导致公费购买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厂家称干部移动办公市场本就存在，称他们的产品老百姓用不上，但对领导干部很实用。

新闻：http://fmn.cc/yW1zx2

【返回目录】

➢➢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开始于 2009 年 8 月，每月在香港举办一场公开讨论，并借助网络视频直播、文字直播等方式将现场放大至全球任何地方。我们希望提供独立、客观、理性的观点和论述，并关注被主流媒体忽略的议题和讨论。目前已举办二十三场讨论，嘉宾先后有艾未未、长平、陈冠中、贺卫方、胡泳、梁文道、欧宁、潘毅、叶荫聪、周保松、许宝强、秦晖等。2011 年 6 月开始，为了丰富论坛的主题，我们在固有论坛的基础上开始一个 Co-China X 系列，这些讨论、沙龙由 Co-China 同一些友好团体合作举办，试图将更多有价值的讨论呈现于网络。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subscribe@googlegroups.com，也欢迎大家转发分享。想加入「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的志愿者团队，请发简历至 forum@cochina.org。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论坛 twitter：Co-China 論壇（http://twitter.com/#!/CoChinaOnline）

论坛新浪微博：CoChina 論壇（http://t.sina.com.cn/1729620664 ）

编辑：柏蔚林 黄隽咏 刘垚

校订：童亚琦

主编：方可成

版面设计：豆弟

配图：潘雯怡 周梦蕾

技术支持：毛向辉 舒欣

出品人：杜婷

